

南方

人物周刊

守夜人 马克斯·韦伯

在祛魅的现代世界
人应该如何生活

本刊记者 徐琳玲

P50 文化

徐小斌

理想主义的一颗棺材钉

P62 明星

达达乐队

永远对一件事情
保持天真

+

P26 社会

张卫荣

从明星企业家、
囚徒到无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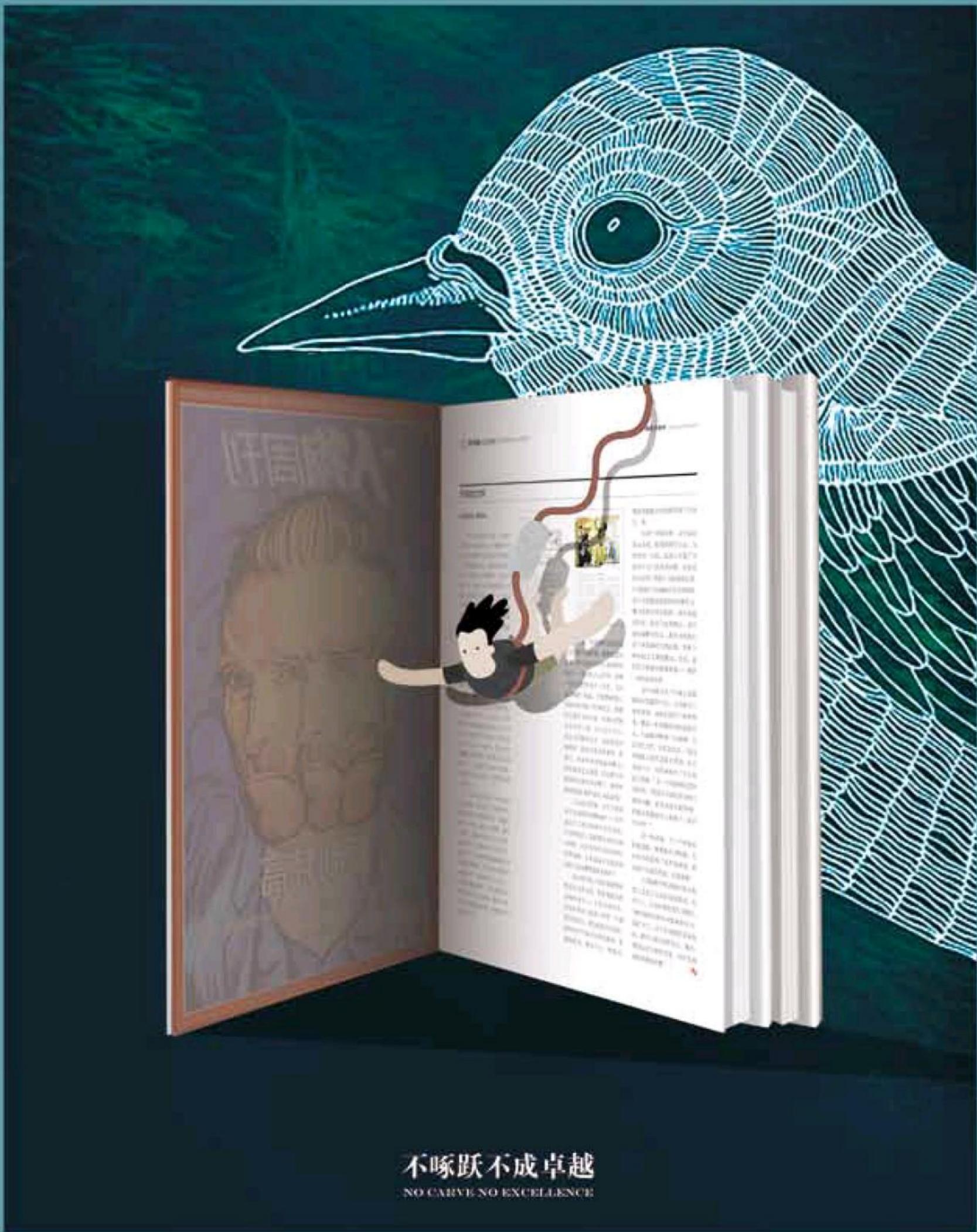
中国邮政发行业务受理 南方周末 出品

ISSN 1672-8335

9 771672 833203

1.50

扫码关注公众号



不啄跃不成卓越
NO CARVE NO EXCELLENCE

不阅读不知阅读的乐趣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于2004年，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为己任，旨在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报道人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创刊十余年，已成长为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家庭读物的首选期刊。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纸质订阅



电子订阅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614/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8335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编号 440100190045
价格 定价10元

主管主办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主编 王巍
副主编(常务) 杨和平
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卫毅
编辑部主任 周建平
总主笔 蒯乐昊 李宗陶
高级主笔 徐梅 徐琳玲 邓郁
主笔 李乃清 王燕青 黄剑
资深记者 张明萌 邱苑婷
记者 陈洋 王小祥 张宇欣
孟依依 赵蕾 杨楠
编辑 孙凌宇 杨静茹
首席摄影 姜晓明
高级摄影 大食 梁辰
图片总监 方迎忠
视觉总监 舒格
资深图片编辑 郑洁
资深校对 赵立宇
资深美术编辑 陈志彤 卢俊杰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邮编 510601
传真 020-87370368
E-mail renwzk@163.com
北京联络处 010-59540399
上海联络处 021-20357312
成都联络处 028-84329133

本刊部分图片由 Getty / VCG / IC / Fotoe / Panos / Osports 提供

总经理 姚伟新
副总经理 孟登科 杨子
总经理助理 王海荣 袁宇 李佩佩
特别顾问 杨昌玉

运营中心华东区总经理 王海荣(兼)
成员 董一扬 王理晖 张艺颖 徐斌

运营中心华北区总经理 李婷
副总经理 邓媛元
成员 张津阁 于琦 过申祥 刘晓梅 王婷婷 张浩森

运营中心华南区总经理 袁宇(兼)
成员 廖颖 韦秋萍 陈晓微 余希桐 张力
梁嘉敏 江喜 柯晓露 徐子敬

运营中心西南区
成员 李勋 曾宪实 侍玉宝

品牌中心
总监 李佩佩(兼)
成员 凌亚 林周 黄河颂 魏运星 蓝鑫焱 王琳
郑永金 陆谢涛 刘籽欣 肖亮

全媒体服务中心
总监 谢仟辉
成员 华东 邱钟琪 刘璇 邱晓艺 钟楚楚
董颖 洪梦玥 朱奇瑞
华北 陈婷 任亚强 王明明 裴益玄
张薇 刘畅 赵宇川
华南 袁斌 何倩仪 莫燕 刘烨
黄焱瑶 吴双 况娟
西南 高杲

销售管理部
总监 黎文渊
成员 华东 张思韵 华北 曹永泽 项子琪 华南 刘金鑫

广东南方数媒工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崔泽华
网络总编辑 肖华
首席技术官 蒲凡

内容部	技术部	运营部
副总监 陈雅峰	总监 张础杰	总监 吴水洁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46-118 国内发行
发行总代理 广东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金城

服务热线 020-87385907
网上订阅 <http://nanfangzhoumo.taobao.com>
联系电话
广州 020-87385907 北京 010-59540392
上海 021-20357389 成都 028-86761177
发行传真 020-87394390

各地购买事宜请与本刊当地发行商联系

天津: 天津每日新书报刊批销有限公司 022-27691305
沈阳: 沈阳铁路书报刊发行公司图书部 024-23910600
大连: 大连环渤书店 0411-84603076
长春: 吉林省天艺文化公司 13844076677
哈尔滨: 志诚远大书店 0451-55689790
郑州: 河南大江投递公司 0371-86063561
济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82055155
烟台: 0535-6649982
石家庄: 石家庄远大书刊 0311-83028579
成都: 尚和书店 028-86667805/86667819
成都现代公众多媒体信息亭有限公司 028-86667983
重庆: 弘景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3-86061012
昆明: 尚和书店 0871-4122816/6518510
贵阳: 尚和书店 0851-5661974
太原: 尚和书店 0351-7189419
南宁: 尚和书店 0771-2624534
桂林: 尚和书店 0773-2834966
厦门: 天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92-5881982
柳州: 尚和书店 0772-3113115/7191772
海南: 海南省报刊发行局 0898-66281313
深圳: 深圳市报刊发行局报刊中心 0755-25921489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755-22203426
香港: 尚书房 中环 00852-28691799
武汉: 明知书店 027-85497619
长沙: 友友书店 0731-82252951
合肥: 文华书店 0551-64688028
南京: 南京晟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5-83717979
温州: 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7-86057222
江西: 江西省华文书店 0791-8592424
新疆: 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甘肃: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0
宁夏: 银川协力书店 0951-6093532

宜宾邮局: 0831-2336474
东莞邮局: 0769-22330708
南海邮局: 0757-86300056
顺德邮局: 0757-22283468
江门邮局: 0750-3500610
中山邮局: 0760-3325321
佛山禅城邮局: 0757-82738580
江苏省邮局: 025-85406711
上海地区上门收订热线: 8008201121
陕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029-87415811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本册印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声明: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 未经本刊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 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 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收费标准如下:

- 1、单篇文章转载使用: 500-1000元/千字;
 - 2、单张普通图片或图表使用: 1500元/张以上;
- 被授权的具体作品价格根据上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

法律事务与版权合作 电话: 020-87001145
E-mail yjyfnzm@126.com

官方网站 <http://www.nfpeople.com>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outhernpeopleweekly>

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uthernpeopleweekly>



官方APP
直接扫描二维码



微商城
直接扫描二维码



订阅Kindle版
直接扫描二维码

CONTENTS 目录



12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守夜人马克斯·韦伯

04 VIEWPOINTS 世界观

74 SUPPLEMENT 后窗

80 COLUMNS 专栏



26 SOCIETY 社会

张卫荣 从明星企业家、囚徒到无罪



44 CULTURE 文化

金雁 回顾青葱岁月

50 徐小斌 理想主义的一颗棺材钉

56 梁缨 画到一定年纪，你笔下就出鬼了



34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维多利亚湖生死录



62 STARS 明星 达达乐队 永远对一件事情保持天真

68 鞠婧祎 偶像没有假期

南方人物周刊申领记者证名单公示

郑洁、赵蕾、黄剑、梁辰
予以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投诉电话：020-87377873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非常性感的

本刊记者 孟依依

去年六哥听说北京城郊的读库库房可能要被拆除，也看到北京其他街区贴出告示来说，如果要拆，要求15天内必须搬走。这样大的库房显然不能在15天内全身而退，所以在拆和不拆两种可能性里，他只能赌一把，并且选择了会大费周章但至少更保险的一种——主动搬离。

几位老前辈趁机把他叫去耳提面命，让他不要再自己做库房了，交给第三方物流吧。结果他非但没听，还把库房升级了。六哥说，反正他和六嫂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追求，六嫂穿几十块钱的衣服都开心得不得了，至于孩子，实际也没有太多开销。

倒是书，一定要有个安全的被保护得好好的环境。毕竟这些书啊纸啊，是他15年来的心血。所以在南通崭新的脱胎换骨后的库房见到六哥的时候，他真是红光满面。

六哥平时就不太爱抱怨——“诉苦、抱怨不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该有的追求”——这几天更是快乐得直哼哼，跟着摄影师跑到这里那里拍摄，跟我说，我在同龄人当中还算不错吧，我也没秃头，是吧。

快乐还因为，接下来比较长的时间里，他又可以把大部分心思放在编稿上了。

100期《读库》，其实我只看过一小部分，大多是创立前期的，这几年来看得更多的是由读库出版的书籍，那些书有一种容易辨别的气质——便携、轻巧，像一个特别安静又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的人站在那里，如果你愿意过去打个招呼，那就过去。

六哥经常说，要让书更像书，“书本身几乎没有创新了，只是为内容服务。经常看到一个编辑说，我做了一本新颖的书，那是他看的书太少了，如果他眼界宽广一点，就知道他所想的所有的点子，无论是设计的灵感还是印刷装帧的灵感，都已经有人做过了。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会那么

追求书的皮相，让一个读书人拿在手里觉得很舒服就行了，我们也不再强调用什么材质，怎么印刷，那是它最正当的一个属性而已。”

而这么多年，这些千万字的内容，都是他精挑细选。

当下记录的手段是最多的，但产出却是最少的。读库能坚持把阅读定位成对读者的冒犯，用一以贯之的敏锐、不讨好、冷静热情生存下来，十分珍贵。

在南通的采访和写稿完成后，我就先回家了。临走前，读库团队的一个可爱姑娘田园送了我两本小书，一本是《读库2001》，另一本是海桑的《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回去的大巴上闲来无事翻了几页，翻到海桑的其中一首诗，说：

即便我是渺小的，我也不难过
我要认识并接受自己的渺小
向那些宏大的事物致敬
那最普通、最平凡、最卑微的就是我吧
我是我自己的宝贝，放在瓦罐里
我甚至有点骄傲，只因为适得其所

读库这篇稿做得仓促，很多东西是在之后这几天我才慢慢醒悟过来的。

比如这几天我的朋友住在我家，她在为她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感到苦恼，苦于找不到书写的意义。我们最喜欢下午坐在厨房里夸夸其谈，扑通扑通吐出些大词，俗称“口嗨”。后来她的导师告诉她，先不要有那么多想法，让你的研究为他人的研究做基石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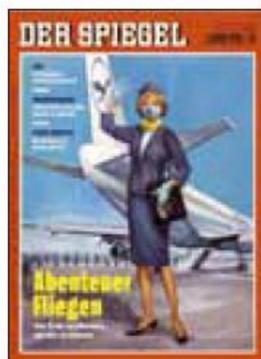
我于是又想到陈晓卿发来的那段语音，说，每次他想拍一部宏大的纪录片，为国家，为人民，六哥就跟他说，你放低一点，放低一点，你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只做自己专业的事情。

这几天愈发觉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即使用最笨的方法、花最多的时间，也实在是非常性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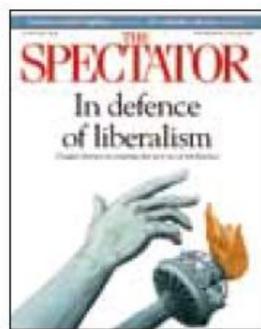


冒险飞行：我们都知道旅途的尽头是什么

乘飞机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日常、普遍和便宜。人们从旅途中归来，抱怨安检站无休止的排队、机上拥挤的空间和糟糕的三明治。加上对于气候的良心不安，飞行似乎从一个梦想变成一场噩梦。没人料到一场真正的烦恼来了：新冠病毒。现在飞行重新成为一场冒险，但并不美好。民调机构 Civey 受《明镜》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13.4% 的德国人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因公或因私乘机。即使在经常出差的高管中，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愿意在未来三个月内预订航班。60.8% 的受访者担心在机上被感染。就时间而言，德国人很幸运，联邦政府正好在夏季假期期间取消了在欧洲的旅行限制。新的飞行世界范围很小，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大量洲际航班。联邦政府近日已将对欧盟以外国家的旅行警告延长至 8 月底。对于汉莎航空、欧洲之翼等航空公司来说，最初这几周极为重要。它们财务状况不佳，几乎每天都会通过特惠和折扣来吸引客户。在最初的几周内，市场、路线以及客户的信任都将被重新分配。欧洲之翼的新任领导比绍夫预言，将会有一场残酷的战斗，会有一些航空公司落伍。据德国航空业联合会统计，目前客流量仅有之前的 14%。



【德】《明镜》
6月13日



【英】《观察家》
6月13日



【美】《福布斯》
(亚洲版)6月

韩国成功抗疫的秘密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韩国出现了因为教徒聚集产生的大量感染个案，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但 3 个月后的今天，5300 万人口的韩国死亡人数少于 300 人，而且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大体正常的背景下取得的，只是让一些学校停课而已，它是怎么做到的？一方面，韩国政府强制感染者安装 APP 进行追踪，并向公众报告他们的行踪，这些措施得以实现的基础是韩国的网络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96%，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 5G 网络；另一方面，韩国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照顾网络比较发达。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领养老金者占了新冠死亡人数的 29%，而韩国的 274 名死者，没有一个是这种情况。英国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主要通过保险等商业化手段，而韩国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资金充足。在传统的韩国社会，让父母住到养老院或者让其他人照顾违背儒家伦理，是不孝顺的体现，但伴随着韩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家庭规模的缩小，社会化养老的观念已经被广为接受。

玩具大王的生意经

香港商人蔡志明拥有的旭日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出口商，代理和生产史努比玩具是他发家的起点。如今，支撑他 66 亿美元个人财富的是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涉及教育、不动产、珠宝和腕表销售等等，而他最新的兴趣是环保塑料行业。在过去的两年里，73 岁的他在广东北部的韶关投资 1 亿美元，和美国企业合资，建成了一家 5 层高、拥有最先进设备的生物塑料树脂工厂，用于制造环境友好、可降解、可折叠的塑料产品 NuPlastiQ，而这将用于他的玩具产品，从而符合近年来欧美社会日益提高的环保要求。新冠疫情对他的工厂没有多少影响，工人主要是广东本地人，没有人染病，海外的订单也没有减少。而类似新冠这样的危机，他经历过很多次。1972 年，25 岁的蔡志明创办了旭日集团。2003 年 SARS 暴发期间，他因为担心员工染病而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幸好一切正常。

冒牌特工

朱江明

近日，一名美国前禁毒署（DEA）雇员被司法部起诉，他在过去几年中冒充中央情报局（CIA）的秘密行动官员，诈骗了至少 12 家公司，总价值超过 440 万美元。

这个名叫肯尼斯·考特尼的人曾是禁毒署的公共事务新闻官（2005—2009 年），还给一位众议员当过公关总监。简历显示，他拥有蒙大拿大学广播新闻专业学位，精通搜索引擎优化（SEO）、危机沟通、公司沟通、战略媒体关系和营销策略，具有在营销和广告行业工作的经验，但总之绝对没有任何执行秘密行动的经验。

作为一名骗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把受害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那么这位公关专家到底是怎么骗钱的呢？这得从美国情报界的外包业务说起。“9·11 事件”之后，美国情报机构除了过去一直外包的保洁、电器维修之类的后勤支援业务，一些核心业务如情报搜集、分析、警卫甚至秘密行动也会外包给一些私人承包商。

这其中有些是必须的，例如大数据分析支持，情报机构未必比一些私营数据公司技术更先进。而另一些业务外包恐怕有利益输送的嫌疑，比如一些情报分析业务，往往都是给已退役的情报官员支持的公司干。这些官员在任的时候干的就是这个业务，现在退休了不拿工资，但是开个公司还干这行。一些现任或者退役的情报官员去一些相关业务公司谈合作，这些企业往往是敞开大门迎接的。毕竟美国政府的钱确实好赚，更何况这种情报业务外包很多细节都是保密的，没有内行人引路根本不可能进得去。

正因如此，肯尼斯的套路就出来了，他首先冒充 CIA 情报官员找企业合作，希望企业支

持他在特遣小组 Alpha214 的秘密行动，并表示这是大大的爱国行为，同时还透露自己将会有一部分业务外包给企业。接下来的事情变得非常套路，要拿到这个政府秘密业务外包你得先给我配个办公室，同时拿出钱来组个项目小组专门干这个，银子自然哗哗往外流，最终一部分落在了肯尼斯的腰包里。肯尼斯的骗局并不新鲜，然而受过训练的骗子毕竟跟野路子骗徒还是不一样的。肯尼斯的骗局有几个颇为有趣的细节，可以说是他的成功之处。

首先作为前禁毒署的雇员，他跟企业打交道的时候会故意使用各种情报界常用的话术和术语，这无疑可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一旦建立起信任，双方就可以开始谈正事了，这时候肯尼斯自然就会提出：以下要聊的是国家高度敏感的机密信息，所以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聊。什么叫安全的地方呢？根据美国情报界的标准，所有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都必须进入敏感隔离信息设备空间（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 Facility，简称 SCIF）。

提出进 SCIF 聊正事当然是非常内行的说法，因为在美国甚至北约的情报界，只要是涉及到国防或情报业务的内容，都必须进入 SCIF 聊。如果在 SCIF 之外聊，出现泄密的情况那责任就说不清楚了。这个 SCIF 不仅是法定程序，而且还有一整套由美国国家安全局颁布实施的建造标准。特朗普选上总统后，他之前的办公场所特朗普大厦里的一间会议室立刻被装修成了 SCIF，就是为了方便他接任总统前进行交接工作。

能接美国情报业务外包的公司都有 SCIF，肯尼斯提出这个要求当然也是合情合理，然而这里边正好就是他的算计。根据规定，所有进



入 SCIF 的人必须把身上所有电子设备都掏出来，SCIF 的门一旦关闭，里边就成了一个彻底的隔离空间，如何大喊大叫外面都听不到。于是乎跟肯尼斯在里边聊什么，只有当事人知道，更狡猾的是，肯尼斯聊的事情当事人也没法录音、录像。

除了不留证据，肯尼斯另外一个妙招是他并不是光收钱不办事的骗子，最初跟他合作的一些公司在给了大把的银子之后，确实会拿到一份合同，并且公司账上很快就收到一笔合作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合同根本就是假的，至于给公司转账的账户也是肯尼斯自己的空壳公司，他的解释很巧妙：“这是秘密行动，当然不可能 CIA 直接给你打钱，必须由中间的白手套办。”反正钱收到了公司也不会多追究这款是从哪里来的。

当然你可能会好奇，肯尼斯不是骗子吗？怎么还会把钱返给公司，让公司有赚头？道理其实很简单，肯尼斯拿了 A 公司的钱后继续骗 B、C 公司，然后把一部分 B、C 公司的钱又返给了 A 公司，然后再接着骗 D、E 公司，再把一部分返给 B、C 公司。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跟忽悠大爷大妈办理财的那些骗子基金公司没啥区别，只不过这次的幌子是支持国家情报机关工作。

如果有人怀疑他的话，他还会用特工身份威胁对方，总之软硬兼施无往而不利。然而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家公司对肯尼斯产生了怀疑，于是向联邦调查局举报，肯尼斯的骗局很快就被 FBI 特工查清楚了。现在等待他的将会是 20 年的牢狱之灾，以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和巨额罚款，毕竟冒牌特工还是干不过真特工的。 



世界观 · 眼界 VISION

编辑 方超超 摄影 rwzkphotos@vip.163.com



北京

6月15日凌晨1点，北京丰台区新发地周边小区正在给全体居住人员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一位医护人员坐在健身设施上登记检测信息。
图 / 人民视觉



德国

6月12日，德国杜塞尔多夫，人们在汽车电影院观看撑杆跳夜间挑战赛。

图/Uwe Kraft



▼
世界观·眼界 VISION

编辑方迎忠 郑浩 wzkiphotos@vip.163.com



守夜人 马克斯·韦伯

在一个“祛魅”的现代世界里，人到底该如何生活？

生命终结于百年前的韦伯没有为今天的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只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智性的诚实，踏实而审慎地行动，以及为自己行为结果负起责任的勇气。

“真正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关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韦伯说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流感和巨人之死

1920年，慕尼黑的春天来得格外地迟。至5月下旬，天气依然阴冷，经常下着小雨。马克斯·韦伯开始咽喉沙哑，症状持续了三天，似乎有所缓解，他又开始和一位女性朋友坐在花园里闲聊。第二天早上，他开始发高烧。医生的诊断结果是支气管炎，认为是他讲课过度劳累造成的。

自1918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到后期，一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命名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病在军营以及往来于欧洲大陆和美洲的船只中蔓延，并在数周内传遍世界各地。据最保守的估计，病毒掠去的人数高达两千余万人，远超“一战”的总死亡人数。

发烧到第二周，韦伯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转。但到周三，他开始出现轻度的谵妄和幻觉。周四，他开始向医生强调自己身体已经康复，但有人听到他在哼唱着一首有关死亡和坟墓的曲子。

他躺在病榻上，抱怨自己的心跳越来越慢，脑子越来越小，“我下一周还要讲课呢。”和他过去二十多年里所受的疾患相比，这次的情形更严重——“那时我还能思考，我还能与全能的上帝斗争。祂不能用疾病来强迫我。噢，如果这次我得的真是肺炎，那么，我就可以清算自己生命的资产负债表了。”

他咳嗽得越来越严重，高烧不退，谵妄症更严重了，不断地出现幻觉。其间，他以一种神秘的口吻庄重地宣告：“真理就是真理。”医生们想着办法把韦伯从死神那里拉回来，他气息奄奄地说：“不要再烦恼了，那样于事无补。”

6月14日当晚，韦伯完成了最后一次艰难的呼吸，安静地闭上了双眼。

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韦伯拥有一串长长的头衔和名号：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比较文化研究先驱……他所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横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宗教、哲学和音乐，是一位真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一百年过去，马克斯·韦伯仍被公认为对

现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

韦伯家的男孩：在知识与信仰之间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出生在德国中部一个名叫爱尔福特的小城。

他是老马克斯·韦伯和海伦娜的长子。老韦伯来自德国西部的一个亚麻商和纺织厂主的家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并投身政治。1869年，他带着一家人迁居到普鲁斯王国的首都柏林。在柏林，老韦伯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他属于右翼自由党，在市议会、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新国会都有席位。

母亲海伦娜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资产阶级中上层家庭主妇，忙于操持家务，养育一个接着一个出生的孩子，还要围绕着丈夫的种种生活和社交需要忙碌，常常到“一到晚上就晕眩”的地步。

海伦娜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新教基督徒，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关怀，总是竭尽所能为陷于穷苦境地的人们提供帮助和救济。但是老韦伯对妻子的精神世界和宗教关切既不关心，也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他整日忙于他的政治事业和社交，周旋于各种会议，为竞选而奔波。回到家中，他总认为自己是家庭的核心，理所当然地享有妻子的爱、顺从和服侍的舒适。

这一对夫妻在婚姻中日渐隔阂，在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情感上也越来越疏远。相比父亲，韦伯和母亲的感情更为亲近，海伦娜常常亲密地称呼他为“我的长女”。日渐长大的韦伯日益同情母亲在家中的处境，对父亲的自我中心、专横越来越不满。

在柏林，老韦伯家是重要的政界社交场所——往来的有政府官员、外交官和学术界知名人士，包括狄尔泰、施密特、西贝尔等当时德国思想界的扛鼎人物。

耳濡目染之中，韦伯家的男孩子们也因此早早地对德国当时的议会、政党议题、政治人物有了很多认识 and 了解，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俾斯麦正在雄心勃勃地推动德意志统一，确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



马克斯·韦伯(左)与弟弟们合影

韦伯幼年时从一次脑膜炎中侥幸存活下来，故身体一直十分羸弱。他很早就展露出在智识上的兴趣，13岁时写过论及德国历史发展和德皇、教皇地位的历史论文。

这是一个有点自负的少年，对学校里的老师缺乏衷心的尊崇，对同学们的“低下”品味也很有些看不上。在当时给就读于柏林大学的表兄的信里，14岁的韦伯对西方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大发微词，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玩弄措辞的文人、一个低劣的政治家、一个没有责任感的演讲者。他认为西塞罗真正该做的事，是用武力消除政治阴谋，而不是向罗马元老院发表高谈阔论的三次著名的演说。

在回信中，年长六岁的表兄对这位自大的少年进行委婉地暗示：认为他不过是在拾人牙慧罢了。气得韦伯写了几封长信，为自己申辩，强调这些见解都是源自他自己的思考。

随着韦伯在智性上日渐成年，对信仰十分认真的海伦娜开始为这个早熟的长子隐隐担心。她一直没搞清他的信仰状态——他和上帝之间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

他极为好学，但对信仰表现出淡漠和怀疑，明显缺乏宗教热情。当海伦娜有意无意地对少年韦伯施加信仰影响，他显露出抗拒——他对布道书不感兴趣，“我注意到，那种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文体完全抓住了他，使他那么专心致志。”海伦娜担忧地感慨。

按当时欧洲的基督教传统，幼儿出生后一个月时受洗礼，到13岁左右时受“坚信礼”，宣告对信仰的确证皈依。一个人只有被施坚信礼后，才能成为教会的正式教徒。

尽管缺乏宗教热情，在智性上，少年韦伯很认真地对待了这项宗教仪式——他把希伯来文学习到能够轻松阅读《旧约》原文的程度。在坚信礼上，他所得到的启示性经文是《新约·哥林多后书》中的一段内容——“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圣经经文能够更好表达支配这个孩子生活的律法了。”在《韦伯传》里，韦伯的遗孀、终生伴侣玛丽安妮留下一句如此模棱两可又耐人寻味的评论。

终其一生，韦伯在宗教信仰上表现出一种徘徊于父亲和母亲之间、两头不靠的情态。

信仰上的最后一跃，要求个人放弃理性。耽于理性的韦伯很清楚自己“欠缺宗教共鸣（religiously unmusical）”，无法做到像母亲那样没有怀疑地投入到对上帝和神迹的虔信和顺服。但是，他又做不到像父亲那样心满意足于世俗的地位、成功和舒适享受，别无他求。

耐人寻味的是，韦伯终其一生把大量的学术精力投入到了宗教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影

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而在熟悉他为人和品格的同事、友人眼中，他对工作的严肃态度和奉献精神，举止中的庄重与情操，以及言谈中所具有的力量与洞见，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倾向。

1882年，18岁的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延续父亲的道路攻读法律专业。这是德国最古老的精英学府，出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批西方思想学术巨子。读书期间，他对文学、经济学和哲学在内的许多人文科学都有广泛涉猎，还在一个表兄的引介下，参与了当时思想界对神学和哲学方面的讨论。

在海德堡大学，他还加入了父亲所属的“决斗兄弟会”，开始饮酒、斗剑，训练自己“桀骜不驯的侵略性”，还因挥霍享乐而欠下债务。他也从一个肩膀下垂、身体羸弱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肩膀宽阔的强壮成年人，脸上有着斗剑留下的疤痕，一扫过往“害羞与缺乏安全感的气质”。当母亲海伦娜吃惊地看到他这副模样，



生气地给了他一巴掌。

在海德堡读书期间，他曾到斯特拉斯堡的军营服役，从一个举止笨拙、总是出错的新兵成为一位有军衔的指挥官。在随后数年里，韦伯几度到军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演习，1888年还参加了在德意志和斯拉夫边界举行的坡森军事演习。

当时，德国走上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对战争、和平和国家一类的政治议题，青年韦伯也有了自己的思考。他当时关注了钱宁所宣扬的和平主义。钱宁是美国著名的宗教思想家和牧师，他的主张中有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他自始至终都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他认为战争是人类一切恶的集中，因而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

多次在部队服役的韦伯并不认同钱宁的观点。他认为，政治和道德之间有着“离”“合”。他对政治的思考，最终集中地体现在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上。

在1897年之前，韦伯的学术关注都集中在经济史和法律史的交叉领域。他在18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罗马农业史》，至今仍是美国许多高校经济系教授给学生开的必读书目之一。

崩溃和崩溃之后

1897年秋，33岁的马克斯·韦伯经历了第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

在此之前，这颗冉冉上升的学术明星过着十分忙碌的生活。25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先在柏林大学接替著名经济学教师戈尔什密特的职位，不久又获得了国家律师资格。1894年秋，年仅30岁的韦伯被弗莱堡大学聘任为经济学正教授，他所做的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两年后，他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一个极为重要的

少年时期的马克斯·韦伯

讲座教席，成为这所著名学府中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在繁重的学术和教学之外，韦伯还给自己安排了许多公共政治事务——为政府机构做咨询，为民间改革团体进行特别的研究，一项有关证券交易所，一项是关于德国东部的庄园。

他总是如痴如醉地埋头工作。每当妻子玛丽安妮试图劝他早点休息，他总是大声说：“我若不是工作到凌晨1点，就不可能算是一个教授。”

韦伯的精神崩溃似乎有某种家族遗传史——他的一个近亲表弟曾进入精神病院，并在病发数年后自杀——但直接的触发原因是：他为了维护母亲，和父亲老韦伯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这次失和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老韦伯不久后就去世了，父子再没有修复关系的机会。

在从西班牙回海德堡的归程中，他开始发烧不退，被内疚、紧张、疲惫和焦虑所压倒，之后身体出现了官能性不适——1898年到1899年间，他开始情绪失控，会在公共场合公然号啕大哭，猫叫声也会让他暴怒不已。

那些过去召唤他生命的智性生活，此时已成“毒药”——当他阅读自己的演讲稿时，那些字总是一团混乱地在他眼前浮游。“无论读书、写字、说话、睡觉，他没有不感到痛楚的；他所有的精神技能和部分躯体机能都拒绝运作。”玛丽安妮描述。

“一只冰冷的手使我得解放”——“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再有需要去感觉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压倒。现在，我最大的希望，是过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并且尽我所能使我的宝贝（对妻子的爱称）快乐。”他在给玛丽安妮的信里如此写道。

海德堡大学不想失去这位已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特准他全薪休假。在一次治疗性度假后，当他试图再次承担一部分教学工作时，又一次崩溃，不得不到一所精神病院接受了几周治疗。学校依然没有准许他辞职，给了他三年



假期，其间薪水照发。但韦伯不能接受自己无法对工作履行全职的状态，最终还是坚辞了海德堡大学的教职。

在给那位自杀身亡表弟的双亲的安慰信里，韦伯吐露出某种心曲：“或许正因为他的病，他发展出一种敏锐的感情，一种自我清明，以及一种深深隐藏着的、骄傲而高贵的内在自我；即使在健康的人身上，我们也绝难见到这些。”

在妻子的照料和陪伴下，韦伯忍受着断断续续的精神折磨，整整四年无法正常读书、写作和思考。直至1903年，逐渐康复的韦伯才重新开始学术生活，他参与了德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的编辑工作。

此后20年间，他时不时地受抑郁症困扰，在紧张的学术工作、精神崩溃和治疗性旅行中来回切换。

在和周期性精神崩溃的角力中，韦伯的学术生活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成果的数量在攀升。1904年，他撰写、发表的研究主题，包括对普鲁斯容克贵族庄园的研究、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以及他最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部分。

被误读和被追捧 ——“精神”、伦理与天职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影响最广的代表作，当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让他

一举成名的著作，最初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于1904、1905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上世纪80年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三联书店于1987年12月出版了这本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带给中国的思想冲击极大。

在人们过往所熟悉的政治经济话语里，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何以谈及“精神”与“伦理”呢？如果对德国思想传统略有了解，都知道“精神”一词在德文中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它具有统领意义、引人接近神圣之境的崇高文化意涵。

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特别容易被误解和误读的书。

一是因为中国缺乏欧美那样的宗教传统和教改运动历史。二是因为思想界几十年来受单一决定论的影响，人们很容易从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反对，走向另一个思想极端——误以为韦伯鼓吹的是“文化决定论”，以及以为韦伯主张的新教伦理观念是欧洲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单一原因。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追溯了宗教观念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事实上，韦伯在历史因果模式上一一直持多元、相对的立场，强烈反对“单一决定论”。1890年他研究农场工人工资时，就提出它并不遵循某种经济“铁律”。1894年，他在弗莱堡大学做任职演说时，认为在生存竞争中，民族、种族方面的差异比经济、阶级方面的因素在因果上有更大的重要性。

对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家工作伦理，韦伯也有着亲身体验。他的父亲来自亚麻和纺织工厂主家庭，叔父卡尔·大卫·韦伯则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企业家，在家庭手工作坊基础上创办了一家企业。老卡尔勤奋工作、省吃俭用，为人既仁慈又矜持。

老叔父对工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韦伯的共鸣——当韦伯深受精神疾病困扰、无法充分履行在大学里的教学工作时，他被这

种未能全面尽职的“良心不安”所困扰。

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和经济上的“传统主义”作比较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而劳动，不追求财富的积累，在必要的忙碌之外，就会选择舒适和休闲。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揭示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精神和基督新教之间存在高度伴随关系。他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自16世纪起，新教徒聚集的地区与资本主义发展明显的地区有相当程度的重叠，资本家、企业经营者、工厂的高级工人和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新教徒。

他随后探究、分析基督教不同分支中历史上存在过的思想特性和差异，引出了路德宗派所提出的“天职”观——即人在尘世中履行的职责是上帝安排的，工作即是服侍上帝，因此变得神圣和有意义。而加尔文宗派所提出的“上帝预选论”，使得新教徒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唯一确据，就是在现世里孜孜不倦地进行职业劳动。

在新教各主要宗派的实用伦理观和他们所倡导的尘世禁欲主义里，世间财富被认为归上帝所有，而人则是上帝财富的管家，因此为了神的荣耀，信徒们必须借无休止的劳动来增益这些产业，在生活中厉行节俭，用以投资和扩大再生产。

1904年完成“新教伦理”第一部分论文后，韦伯在学者明斯特贝格的邀请下，携妻子到北美参加学术活动，并参观游历数月。回到德国，他于次年接着撰写了第二部分——《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美国期间，韦伯亲眼目睹了清教徒们勤勉节俭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以及北美大陆上各种教派生活敬拜的场景。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兴致勃勃地观礼了一场洗礼派的入教仪式，一位新入会的年轻人将自己浸入冰冷的湖水中。然而，他身边的美国亲戚向他揭了一个“底”——这位年轻人并非虔诚，他要在当地开家银行，为了赢得该地区客户而入教。

如此看来，个体所谓的“信仰告白”，似乎



也不过是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或前提。

但洞察力非凡的韦伯却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一家教会对成员的入会“资格”审查，并未放在个人无法自证的“内心信仰状态”，而在于他外在呈现的伦理、品格上。如果此人一贯诚实勤勉、作风正派，并在社区广受好评，即使他是为了商业目的而加入某家教会，这样做也不是虚伪。因为他是用自己良好的品行，去赢得作为商业信用证明的教会成员资格。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刊发后，一度引起许多教内人士和神学家的不满和批评，认为韦伯亵渎了他们的信仰。但正如韦伯在该论文里所强调的，他所探究的，不是新教信仰和教义本身，而是拥有什么样的伦理、人格与品质的个人、社会组织和共同体才能够真正驾驭资本主义。

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末尾，他出乎意料地抒发了一番沉痛的警告。

韦伯已经预见到：随着物质财富不断积累，

1917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图灵根州的劳恩斯坦城堡参加一场非正式聚会

利益引诱着人们忘却初心，逐渐在现世的享乐中“沦落”。尤其是伴随着现代科学发展更为彻底地祛魅，以及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日常，也就产生越来越多“没有灵魂的专家”与“没有心肝的纵欲者”。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的表现，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所在。他将这种精神看成西方文明的支柱，如果西方文明会没落，那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消失了。

倒数第二次演讲：暗黑和守夜人

1917年11月7日晚上8点，在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艺术厅，韦伯做了一番主题为“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

正在慕尼黑大学就读、年仅 22 岁的卡尔·洛维特如此描述他眼中的韦伯形象——“他苍白而疲惫，急促地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这场演说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

德国的自由青年运动正在激烈讨论大学生们所面对的文化政治问题，特别是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下的专业化与职业的问题。巴伐利亚的“自由学生联盟”于是决定邀请一批专家，探讨生活与精神在现代世界中的关系。韦伯被视为处理这一主题的绝佳人选。

而韦伯接受这次演讲邀请，是因为有他想回应的重大社会议题。

此前，韦伯应一位书商的邀请，出席了对方在劳恩斯坦城堡举办的非正式聚会。他于 5 月、10 月两度与桑巴特、梅尼克等许多文化人以及青年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讨论德国当时面临的文化与政治问题，主题分别是“我们时代的意义与使命”和“国家与文化中的领袖问题”。

当时，德国正处于“一战”的炮火中，国内出现了各种对立、撕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流派，从左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再到形形色色的文化悲观主义、新浪漫主义等。

在劳恩斯坦城堡，韦伯夜以继日地与持有各种不同价值和理念的人交流。他激烈反对各种浪漫派的政治主张与文化观点。与会的青年们被韦伯的“个性与理智诚实”所感召，非常渴望韦伯这样的人能在思想上引领他们，在德国政治与文化的危机时刻充当他们的领袖或先知。

在这场面向青年大学生的演讲中，韦伯把话题从“如何做学术”悄然转向了“为何要做学术”。

在演讲中，韦伯一一推翻过往人们通常以为的“神话”——譬如，追求知识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我们所处的世界，譬如学术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完美的人生。在中国的历史



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11月7日发表《学术作为志业》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语境里，传统的士人也有类似的观念，即学问之道能帮助我们安身立命。

他也戳破了西方知识界几千年来所信奉的一个“神话”，即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讲述的“洞穴”寓言——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走出了洞穴看到了太阳，发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也是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原型。

然而，韦伯指出现代学术和科学恰恰是通往“意义碎片化”的道路，是一条通往“怀疑”的道路。“科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宗教和信仰奠定基础，无法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纷争，也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根本的指南”，“所有过往对道路的理想都只不过是幻觉，学术已经失去了传统期许的价值和意义。”

在一一击碎种种幻觉和神话后，韦伯提出了学术存在的价值。除实用性、思想方法这两种“浅显易懂”的价值之外，他提出第三种也是最为重要的益处——科学或者学术能使人的头脑“清明”。

在现代世界里，各种各样的信仰、价值立

场并存，犹如古希腊神话里的“诸神之争”。当一个人选择了某一种立场，他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所选定的目标，才会不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并避免事与愿违呢？

韦伯认为：科学或者学术无法替代我们承担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它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只有具备这种“自我的清明”，一个人才能在“内心一致上”形成完整的人格。

在祛魅的现代世界里，科学或学术虽然丧失了让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但它可以“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因此仍然值得对其有热爱与激情的人将其视为志业。

年轻的洛维特以“极其震撼”来描述这场演讲对自己的震动——“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他提问题之犀利，一如他拒绝诉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在文艺积极分子们做过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演说之后，韦伯的话真可说是一种救赎。”

听完演讲之后，这位 22 岁的犹太裔青年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召唤，决心投身哲学。不久转学到弗莱堡大学，先后投在胡塞尔、海德格尔门下，后来成为 20 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在我作为记者的工作经历中，曾有不少五位学者在采访中提到韦伯这篇演讲带给他们的触动与感召，以及在认清现实中种种不利因素后仍决定投身学术的一份清醒的确定。

“每次有学生找我商量是否应该考研读博，我都会建议他们先读一下韦伯的这篇文章，冷静下来想一想，再来做这个事关个人前途的重要决定。”一位青年学者分享说。“但有点事与

愿违的是，好像每次他们都读得心潮澎湃，急着跑来和我说：老师我真的愿意。”

现代性精神危机：萧瑟与冷峻

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里的一个片段。当有人从西珥问守夜人——“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人回答说：“黎明将到，但黑夜会再来。如果你们还想问，再来问吧。”

这是《旧约》中古以色列王国的先知以赛亚指着以东所发的预言。

在描述现代社会特性时，韦伯独创性地提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词——“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中文也常常译作“去魅”“去魔”“解魅”“解咒”。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有神话“魅惑”的世界里——他们相信有神、精灵和鬼怪的存在，而这些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存在是冥冥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得以和整个宇宙连成一体，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自身生存的意义。

待进入现代后，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探索世界和认识自己。一场精神的巨变也由此发生，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enchantment）被理性化的光芒所驱散，这就是韦伯所谓的“世界的祛魅”。

韦伯以一种不带价值判断的态度来描述这场精神巨变——“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如此，人以什么为信仰，应当如何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于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自由，很可能成为个人不堪重负的负担——因为得不到理性的凭据，抑或一个超越性存在（上帝或神）的绝对保证。

同样地，在政治领域，现代社会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也无法通过知识、

理性的辩论来获得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永恒的斗争”。2020年，在新冠肺炎重袭下，各国之间爆发的对立、冲突和动荡，让这种困境显得尤为真切、难以找到出路。

专长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刘擎如此认为：“从整个20世纪到今天，西方思想界反复探讨、争论不息的：现代人的心灵危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政治决断论，以及极权主义的起源，都和韦伯所揭示这一知识和信仰的分裂有关。”

在现代世界巨大的荒芜面前，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

即使是生命光景坠落于最黑暗的时候，韦伯也不允许自己软弱到投降，而是展现出一种为自己所选择的立场负责到底的勇气抑或“傲慢”。1908年，当个人精神崩溃期间，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如此写道：“逆境教人祷告——一定如此吗？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无法苟同。当然，我同意你的看法，情况经常是如此的——就人的尊严来说，经常得过了分。”

正如韦伯在其最后一次重要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所言：“真正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关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他在海德堡大学的朋友、哲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把韦伯视作这样一种“新型的人”——能够不必诉诸幻觉，把自身内部极度的紧张以及外在生活的诸般矛盾，综合在一个统一的状态，保持精神上的宁静。

“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

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人格特和怀特·米尔斯曾把韦伯称为最后一代“政治教授”。

韦伯是卷入政治生活的那种学者教授。雅斯贝尔斯甚至为韦伯感到惋惜，认为他把才智和精力“浪费在政治事务上”而不是用来“使自己更超然”的每一天，都是损失。

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韦伯从少年时期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他热爱德国，但对德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人物常常感到失望与不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韦伯面对德国在欧洲的孤立处境，感觉自己犹如坐在“一列奔向无底深渊的快车上，不确定下一个转辙处的轨道是否已经转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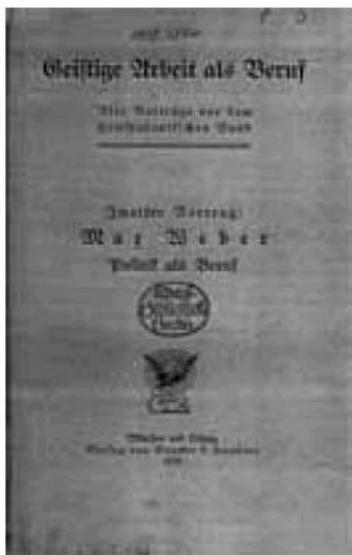
1914年，“一战”爆发，已经50岁的韦伯强烈希望能到前线去。因为他是后备军官，被任命设立并管理海德堡地区的九所野战医院。

他管理得井井有条，努力将其转化为一个有秩序的官僚组织。

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1918年，韦伯以专家的身份，随同德国代表团前往凡尔赛参加和平会议。他和德国陆军将领鲁登道夫有过一次会面，和这位兴登堡最重要的助手有过长达数小时的争辩，他要求鲁登道夫为德国参谋部所犯下的政治错误负责，“牺牲自己，挽回国家的荣誉。”

1919年1月28日，在德国宣布投降的两个月后，韦伯发表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演讲中，他区分了官僚和政治家的本质不同，提出政治家是“为政治而活”的，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韦伯很早就认清一个观点：政治不能只当作一件道德事业来判断，两者是有“离”“合”的。在1919年的这次演讲中，他特别提到政治家所面对的两种伦理要求，一是“心志伦理”，一是“责任伦理”。前者要求行动者无条件地忠于自己所信奉的理想原则，不计后果，不论成败；后者则要求行动主体特别关注行动的后果，并对后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德文版，1919年



今天，我们把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涂尔干同列“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但是，必须公平地指出，如果不是玛丽安妮的功劳，韦伯的著作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生前，韦伯也仅仅是德国以及欧洲众多杰出学者中的一员，如研究韦伯的权威学者京特·罗特所言——“韦伯的声音能否在喧嚣的论战中脱颖而出并且传诸未来，还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当时名噪一时的社会学家奥特马尔·施潘就宣称韦伯不过是“一位走火入魔、躁动不安的人物”，擅长通过人格力量影响他人，“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毕生从事的工作在身后能够历久长新。”施潘还武断地认为：韦伯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的学科已经过时。

然而，玛丽安妮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伟人，一位伟大的学者。1920年韦伯去世后，她用六七年时间整理、编辑韦伯留下的大量学术思想遗稿，相继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集》（1921）、《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

其中，韦伯全面表述其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的巨作《经济与社会》，在他生前仍未完成。1921年首次出版后，玛丽安妮四年后又重新修订该书。1998年国际社会学协会445名成员的投票结果显示，《经济与社会》被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

除整理、出版韦伯的学术著作外，这位遗孀还完成了一部内容厚重的《韦伯传》。这部保留着大量私人书信内容的传记，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苦和挣扎的人间英雄形象——他为保持心智健全和思想创造力所付出的努力，他和家族之间的代际冲突，夫妻之间的紧张，以及围绕着他们的疾病和死亡。

果负起责任。

一项具体的政治行动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后果。因而，韦伯尖锐地批评偏执于心志伦理的人，认为他们“幼稚而且危险”。在他眼中：真正的政治成熟，在于一个政治家最大限度地保持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在信念的激励下，清醒地判断、审慎地行动。

“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他如此说道。

韦伯是谁？是玛丽安妮的男人

在马克斯·韦伯的生命中，有两位对他最至关重要的女性：一位是母亲海伦娜，另一位则是妻子玛丽安妮·韦伯。

在辛劳地完成这一切后，1926年玛丽安妮给德国社会学家保罗·霍尼希斯海姆的信里这样写道——“在我看来，韦伯的声誉只是刚刚开始。人们在得到他的著作时会目瞪口呆的。我的生活就是为了使他永世长存。”

但是，玛丽安妮绝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种隐在名人丈夫身后的“贤妻”。

她本身是一名有所建树的学者，一位活跃的妇女活动家，曾担任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据说，海德堡曾有两个匠人聊天，一个问：“韦伯是谁？”另一个回答说：“是玛丽安妮的男人。”

玛丽安妮原为老韦伯家的一位远亲。1892年，22岁的玛丽安妮到柏林接受专门的职业教育。在韦伯父母家的这次重逢，让两个年轻人彼此有了特别的情愫。之前韦伯曾经爱过母亲家的一位远房表妹。经过一番简·奥斯丁小说式的误会、道德迷茫和困顿后，韦伯和玛丽安妮终于走到了一起。

因为亲眼目睹了母亲在婚姻中的被剥夺和不幸，韦伯从心底认同男女平等的观念，是怀着一种要求两性平等的自觉意识开始这场婚姻的。订婚后，在给玛丽安妮的信里一边称呼她为“我的孩子”，一边宣告“我们将自由而平等地站在一起”。

玛丽安妮没有受过正规的中等教育，仅仅在20岁左右读过两年女子寄宿学校。但婚后在韦伯的支持和鼓励下，她在学术和组织、领导妇女运动上皆有成就。她的学术著作，甚至引起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德国学者鲍尔森的关注，并和她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和争论。

这是一段十分艰难、充满挑战的婚姻关系。在短暂的数年甜蜜生活后，韦伯就遭遇了最严重的精神崩溃，此后二十来年反反复复地受这一疾病的困扰。

但玛丽安妮是一名意志坚强、勇气非凡的女子。她从小就是在疾病和死亡笼罩下的严酷环境里长大的。她一出生，母亲就死于难产，身为医生的父亲不久又患上精神分裂症。韦伯病发后，她始终站在他身旁，以顽强的意志、清醒的头脑面对婚姻的道德责任，和当时欧洲

各种时髦先锋的享乐主义思潮进行论争，同时完成了一个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

在玛丽安妮之外，韦伯还和一名叫埃尔泽·贾菲的女性交往甚密。韦伯的研究者认为：埃尔泽是韦伯晚年的婚外情人，据玛丽安妮描述，她“有着迷人的风度、机智的谈吐”。

在“一战”前，欧洲一些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新潮知识分子开始鼓吹“新伦理”，他们提倡性解放，反对一夫一妻的传统婚姻。在这一派心理学家奥托·格罗斯的影响下，埃尔泽和她的妹妹成为这一“新伦理”的践行者，并和格罗斯诞下了非婚生的孩子。韦伯成为这个私生子的教父。

韦伯的弟弟、学者阿尔弗雷德也追求过这位散发着“女巫”魅力的女性，并一度成为埃尔泽的情人。后因韦伯的“插足”，这段恋爱关系宣告终结，兄弟之间也因此一度失和。

此外，在玛丽安妮为韦伯撰写的传记里，还隐晦地提到了韦伯另一位比较亲近的女性朋友——来自瑞士的女钢琴家米娜·托布勒。

玛丽安妮似乎冷静、理性地处理了这些在她和韦伯二人之外的复杂情感，并和韦伯的女朋友们建立了稳固而长久的友谊。

在最传统的排他性亲密关系里，被人们视作保守的、道德严格主义代言人的玛丽安妮为何会如此行事呢？

在她写的《韦伯传》中可以找到解答——她很清楚，这些来自其他异性的友谊、陪伴和情感滋养，给韦伯精神的安宁、思想创造力的激发带来种种显而易见的益处。

韦伯离世34年后，他的遗孀在他的情人陪伴下闭上了双眼。



（参考书目和文章：《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慧美译；《马克斯·韦伯传》，玛丽安妮·韦伯著，阎克文、姚中秋译；《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刘擎著）



2020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评选 首批候选名单揭晓



扫码先睹为快
预见CSR新趋势

评选征集持续进行中 欢迎报名参评

邮箱: nfzmcsr@126.com

电话: 020-87374330

SOCIETY 社会



张卫荣

从明星企业家、囚徒到无罪

本刊记者 黄剑 发自苏州、九江 图 黄剑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的进步，增强了张卫荣洗脱罪名的信心。曾卷入经济纠纷、身陷囹圄两年零六个月的张卫荣，在出狱后的三年多里不断搜集材料、提出申诉，最终恢复无罪之身

6月5日下午，张卫荣驾车从江西共青城返回老家苏州莲花岛。他在阳澄湖的这一片水域，有20亩蟹田。他预备在此休息一段时间，一面照看蟹田，一面等待法院的通知。

在这之前的几天里，他向共青城市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刑事自诉状，力图挽回他在过去十年里的损失。

张卫荣是在共青城投资的苏州企业家，2013年，因为与投资人发生经济纠纷被抓，之后被判入狱两年零六个月。2019年8月，他被改判无罪。自“代小权案”之后，他的案子也成了共青城甚至江西最受关注的商业事件。

企业家改判无罪

2016年3月25日，张卫荣走出江西德安看守所。在关押了911天之后，他终于重获自由。

“看到了灿烂的阳光，之前两年半的郁闷也消退了，只是感觉时间很快就晃过去了。”他离开看守所后，前往共青城看望丈母娘。老人身体不好，看到这位前女婿来看自己，说以为再也看不到他。

之后，张卫荣回到苏州老家，在莲花岛上一边休整，一边把自己过去几年遇到的事一件件翻出来，慢慢琢磨。

他脑袋里一直是懵懵的，不清楚为什么坐了两年多的牢。不过，他心里明白一件事，自己没有犯罪，“吃了一场冤枉官司。”在随后的三年多里，他不断搜集材料、提出申诉，最终把自己从囚徒变成了无罪之身。

2016年5月1日，在老家休息了一个多月后，张卫荣重返江西，第一站是南昌。他去了江西省纪委举报中心，又赶到位于八一大道附近的省信访局。在这之后，张卫荣回到共青城，找到案件的经办警察冯杰，自称被冤枉了。冯杰见到他，很惊讶，告诉他自己只是办事员，做不了主。

过了几天，张卫荣又到九江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他一直在向江西、九江和共青城等地的相关部门递交材料申诉，希望为自己洗脱罪名。提交的申请没有回音，他有时也会觉得沮丧，甚至灰心，在莲花岛借酒浇愁，直到“代小权案”改判，他对翻案又开始信心十足。

2010年9月，手机研发商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经招商引资，入驻江西省共青城市，投资3亿人民币成立共青城赛龙公司，三年后产值即达40亿元。2015年，其创始人代小权突然以涉嫌“逃税罪”被逮捕，两年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代小权随后上诉。2018年2月11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撤销一审判决，宣判代小权无罪。此案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

宣判当天，张卫荣专程赶到九江中院，旁听庭审。宣判之后，他特意找到代小权，一起

2020年6月初，张卫荣向共青城市人民法院提交与顾三官等股权纠纷案再申请

在九江中院门口合影。“整个庭审过程中，疑罪从无的理念、对证据的质证、有特殊专长的专家对部分证据的佐证等等，最终让代小权被当庭宣判无罪，这给了我信心。”张卫荣回忆。

几个月后，另一名更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也得到平反。这一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无罪。张文中是物美集团创始人，此前曾入狱七年。

企业家柳传志在看完庭审直播后，对央视财经频道说：“一是为他高兴，也为我们自己高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也向媒体表示：“张文中被改判无罪，标志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好，也标志着我们国家会朝着依法治国的道路往下走。”

2018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出《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依法保护企业家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同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强调“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

这一年，多名企业家如张文中一样被改判无罪。“2018年，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平反了。信号就是要依法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改善营商环境。我的案子就是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我更增强了信心。”张卫荣看到政策变好，又受到代小权、张文中等案鼓舞，开始重新为洗脱罪名奔波。

从2018年7月开始，他又多次驾车从苏州前往九江，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提交申诉材料。这年11月21日，转机开始出现。“那天，共青城法院的窗口正式收取了我的申诉材料。”张卫荣对未来有了更多期待。他认为，申诉材料被法院收取，从法律程序上来说是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在此之前，共青城落马了一些官员，其中部分人正是张卫荣一直在举报的。“他们被调查，跟我的案子无关，但客观上减少了案子重审的



阻力。”张卫荣说。

因为“代小权案”的影响，一些媒体也开始关注同在共青城营商的张卫荣。大量报道出现，也让张卫荣成为代小权之后，最受关注的共青城企业家。

张卫荣案开始引起更高层的重视。2019年初，江西省相关负责人责成该省政法委介入，并由九江市政法委组成调查组，对此案展开调查。5月7日，张卫荣收到江西省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发来的《再审决定书》。

2019年8月6日，张卫荣虚开发票罪、职务侵占罪及挪用资金罪案在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法院当庭判决：张卫荣无罪。

共青城工厂

在关押911天、维权三年之后，企业家张卫荣最终为自己洗冤成功。不过，因为这一变故，他早已一无所有。他在江西共青城和九江的公司已经没了，资产被查封，苏州的房子也被拍卖，甚至婚姻也结束了。

张卫荣生于1969年，从小生长于苏州莲花岛。当地人一直以种田和养蟹为生。改革开放

后,许多人开始经商、办工厂。受这种氛围影响,张卫荣很早就开始自己做生意。

1989年进入大学后,他经常把老家乡镇企业生产的服装带到学校,在附近的街道摆地摊。“那时候物资紧缺,东西很好卖,而且我挑的货都是外贸商品。”到1992年毕业,他已经有了3万元存款。

张卫荣最初做手机配件生产。2006年,光伏行业兴起,他觉得这个市场会很大,筹集了一笔资金,在苏州富泰路建了一座厂房,转行生产光伏产品。经营几年,年销售额近3000万。

2009年初,江西省政府驻江苏办事处的一名干部到苏州招商,邀请张卫荣去江西考察。那时候,他的工厂正准备搬迁。3月,在这名干部的安排下,他和另外六名苏州青年企业家一道,去了江西新余、九江和共青城等地考察,最终决定把工厂搬到共青城。

“我前妻是共青城人,当时她和我老丈人、丈母娘都反对我去共青城投资建厂,他们觉得离家远,担心我对当地不了解,也担心我可能是一时冲动。”张卫荣不以为意。

当时苏州的光伏企业聚集,竞争激烈,土地、人力价格也较高。张卫荣的工厂订单越来越多,需要扩大产能。而共青城的土地、人力成本等更有优势,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也给予了多项政策优惠。

“苏州工业用地每亩要17万多,共青城的价格是每亩4万。”张卫荣卖掉了苏州工厂,在共青城购买了150亩工业用地,注册成立江西启维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西启维”),于2009年8月26日与江西共青城开发区签署投资合同及投资协议。

张卫荣也有顾虑,在签协议时,他希望补充一条:“企业和政府产生矛盾时,不得以偷税、漏税或注册资本抽逃等罪名,把企业老板抓起来。”不过,当时的共青城开发区工业新区服务中心主任邹秀峰说,这样写太难看,绝对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2009年9月,张卫荣启动共青城工厂,年底正式投产。新工厂投资3000万元,厂房两万

平方米,员工150人。2010年前后,正是光伏行业最鼎盛的时候。半年不到,他的工厂每个月已经有2000万销售额,员工也增加到330人。“供不应求,订单来不及做。”他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

江西启维投产以后,发展迅速,俨然成了当地的明星公司。各级领导经常会带队前来参观视察,“有省一级的干部,也有省里的其他企业人员,有时候一天好几队。我们有一个副总专门负责接待。有时候工人休息,还从外面找人换上工作服,应付视察。”张卫荣介绍,因为当时共青城的企业并不多,整个工业园只有十多家,当地政府也希望鼓励并吸引更多企业到此投资。

自从入驻共青城,当地政府一些官员希望张卫荣能尽快扩大规模。投产半年,一些领导经常找到他,要求他争取次年把生产规模扩大至10亿元。彼时,位于江西新余市的光伏企业江西赛维已成长为“百亿”级别的公司,九江也出现了“20亿”级别的同行企业。

“我们只能根据自身的实力、资金来做。如果市场销售渠道没建立好,把规模提上去,以后会出问题的。”张卫荣不想过于冒进。

左图:江西启维原厂房所在地
右图:共晶光伏所在区域



失去公司

2010年下半年，张卫荣开始有了资金压力。为了增加生产线，他需要更多资金。

这一年8月，他经常在苏州都市花园的别墅里打电话，寻找投资人。邻居陆福荣听到他的光伏项目缺钱，想找人投资，便说要帮忙。陆福荣也是商人，比他大11岁。两人因为是邻居而结识，经常一起聊天，关系熟稔。

不久，陆福荣把商人顾三官介绍给张卫荣。顾三官在苏州颇有名气，以钢材贸易起家，涉足过地产，长于资本运作，持有多家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股份，自称“投了两百多家”。

“张卫荣跟我说，他在共青城有一家光伏工厂，每个月赚一千多万，只缺流动资金6000万元，就能弄得怎么怎么好。”顾三官对

《南方人物周刊》说。

顾三官表示愿意与张卫荣合作，他计划在共青城买1500亩地，修建一座标准厂房，要把启维做上市，之后还建家具城、建材市场。“他说计划投80亿，给我描述了这样一个蓝图。”张卫荣介绍。

2010年国庆期间，双方签署了“框架投资合作意向书”。顾三官称，张卫荣愿意以6000万元出让江西启维96%的股份。“我们股东签完字后交给陆福荣，他再拿去给顾三官、陈景庚(为顾三官给启维做尽职调查的会计师)签字。”张卫荣称，这只是合作意向，并没有最终确定。

10月8日上午，张卫荣因要出差，把江西启维的公章、法人章和财务章交给陆福荣保管。“我对陆福荣很信任。”他称。第二天，张卫荣搭飞机从南昌飞往上海。10日，他和两名同事前往美国，参加展览会，18日回国。在此期间，顾三官通过其控股的江西共晶光伏

2020年5月，张卫荣在去往阳澄湖蟹田的船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共晶光伏”），分别于10月9日和12日汇给江西启维两笔资金，共8000万元。

回国之后，张卫荣找陆福荣收回江西启维的公章，被拒绝。“他说顾三官给启维汇了款，并已支付出去很多。”张卫荣听到陆福荣如是说，觉得惊讶，要求查看账目，也被拒绝。由于公司治理不够规范，江西启维当时甚至没有专门的会计人员，只有一名出纳。他发现自己已经对一手创立的江西启维失去控制。

之后他又多次找顾三官和陆福荣处理此事，未果。2010年10月25日，他让一名部下在《九江晚报》上，刊登江西启维的公章和财务章遗失作废声明。

顾三官则称，张卫荣在收到8000万汇款后，单方面中止原定股权转让约定。他向《南方人物周刊》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2010年10月17日，张卫荣曾给陈景庚发短信说，取消双方合作。“不跟我合作了，我就说这样，你（张卫荣）这8000万是算借我的钱，写了个借条。20号必须还我钱。他全部答应，到了20号没有还，我们后来就到法院起诉他。”顾三官说。

10月26日，江西启维的厂房、设备、仓库被共青城市人民法院查封，账户冻结。这家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就此停滞。

“我不知道汇进来多少款。我们双方的合作意向是个人投资进来的，具体金额和股份还没确定。”张卫荣称，直到多年以后案件重审，看到这两笔汇款凭证，才知道有8000万元转入江西启维账户。“2019年2月，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张借条说江西启维借了顾三官8000万。”

本刊记者看到的一张借条复印件显示：江西启维向共晶光伏借款8000万元整作为流动资金，月息按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借款期为15天。落款日期为2010年10月8日。借款人处只有江西启维公章，没有法人张卫荣的签名或印章。

2010年11月10日，张卫荣收到一份诉状，要求江西启维偿还共晶光伏5649万元。“当时

启维在顾三官他们控制下，我不知道任何账目往来。”张卫荣称。

经济纠纷变成刑事案

2010年11月18日，在时任共青城开发区工业新区服务中心主任邹秀峰办公室内，张卫荣及四名小股东与顾三官、陆福荣等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江西启维（此时已更名为共青城荣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顾三官、陆福荣等，价格为500万元。

“在政府做工作后顾总口头接受。”顾三官提供给《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份“事情经过”记录显示。

张卫荣则称自己在被胁迫之下签订此协议。“转让价格，顾三官从最初的3000万，跳到1100万，后来又变成500万。”张卫荣称，签订协议前，陆福荣曾经找过他说，顾三官掌握他涉嫌注册资本出逃的证据，让他认错。

“这个行为确实有，我也怕坐牢。”张卫荣说。他在成立江西启维时，借了1500万元，注册成功后，便取出还了。不过，全国人大在2013年底修改公司法，这一行为之后不再入罪。

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张卫荣多次向顾三官讨要500万元转让费，被拒。顾三官称，经过核实，发现江西启维过去有数笔应收账款，客户不予承认。“如果收不到应收账款，（转入协议）就没有法律成效。”顾三官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双方进一步交恶。2013年下半年，张卫荣起诉顾三官等，试图索回工厂。因为这一诉讼，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共青城欧唯诺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原江西启维，更名为共青城荣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顾三官控股后改“欧唯诺”名，下称“欧唯诺”）价值5000万元财产。

2013年8月至9月，顾三官控股的欧唯诺先后三次向共青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称张卫荣涉嫌虚开发票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同年9月26日，张卫荣被共青城市

公安局刑拘。

被拘之前几天，当地几名官员与顾三官的代表在共青城开过一次调度会，会上决定刑拘张卫荣。2018年末，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受理张卫荣案再审申诉后不久，邹秀峰给张卫荣发来短信，证实召开了这次会议。

“你查封顾总公司后，顾总几次找政府。黄斌书记组织开过此事专题调度会。我作为分管园区领导自然参加了会……我真不希望你们把事情闹大。后来，共青公安介入，才导致事情不可控。”邹秀峰在短信中写道。黄斌时任共青城市委书记。

2017年，黄斌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40万。黄斌的妻子叶美娥后来去监狱看望他，他也曾提起这次调度会。叶美娥对《南方人物周刊》说，黄斌于2013年6月调任共青城，与张卫荣不认识，也不了解。

而参与这次调度会的时任共青城公安局局长张晓林也因涉嫌受贿、涉黑等，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调度会所涉及的多名官员，目前或已落马、或被降职，不过与张卫荣案并无关联。

2014年12月24日，共青城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判处张卫荣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张卫荣不服，提出上诉。之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案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015年11月25日，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判决称，张卫荣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以虚开发票罪，判处张卫荣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2016年3月25日，张卫荣刑满释放，三年多以后，他被改判无罪。

出狱后的生活

华灯初上，张卫荣和朋友来到九江的一家江西餐馆。他点完菜，便出门转入隔壁的烟酒商店，买了一瓶四特东方韵。他每天都会喝一

点白酒，低落时喝得多，高兴时喝得更多。

这是2020年6月的一天，他觉得这天值得喝几杯。过去两天，他做了两件事：处理国家赔偿问题和向法院递交自诉状。这是改判无罪之后，他觉得最重要的两件事。

自从被改判无罪后，张卫荣便通过律师开始申请国家赔偿。2020年2月3日，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对张卫荣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支付其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38万余元。

张卫荣还向共青城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刑事自诉状”，起诉苏州商人顾三官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诬告陷害罪，非法骗取他在共青城的公司。他希望通过这一方法，挽回原江西启维的资产。

法院接收自诉状后，他特意回到共青城市公安局。不少人认出他，主动过来打招呼。“他的案子，我们这里差不多的都知道。”走廊里，一名警官说道，并邀请他忙完之后，去办公室聊天。

他到这里，是为了找曾经办理他案件的两名警察，希望碰碰运气，让两人为他提供证据。不过，在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两名警察并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给他。

自从出狱后，他一直想通过法律手段索回失去的资产。而在顾三官看来，自己才是被张卫荣骗的那位。

只要不跑案子的事，张卫荣大多时间在莲花岛老家。曾有一家光伏企业邀请他加盟，但因为案子的缘由，要经常往返于苏州和九江之间，他只好婉拒。

在莲花岛，他养了20亩大闸蟹，并与当地一些蟹农合作，挑选优质大闸蟹在网上售卖。这是他出狱之后的重要生活来源。他还在岛上开了一家农家乐，自己学着做叫花鸡，期待在疫情彻底消失之后，可以逐渐红火，然后再交一个女朋友，结婚，开始新的生活。 

（实习记者林澜、李彤、熊韧凯对本文亦有贡献）

你收到一封 编辑部10年前写的信



这些年没少惹你，亲爱的读者。

没办法，如果我们说的都是你想听的、你猜得到的、你知道的，可还有意思？

下面这封所谓的“信”，其实是《南方人物周刊》5周年纪念特刊里编辑部卷首语的节选。

话是2009年写就的，一晃已逾十年。你看放到今天，情意可有变？



最早给我们捧场的读者，一定还记得他们看到2004年6月的创刊号张曼玉和第二期马加爵时的惊愕——这本新杂志的定位是什么？

两个封面，两张脸：前者明艳灿烂，她的笑容是胜利者的，她的手朝着粉丝们挥动；后者被杀人事件涂抹得一团漆黑，阴沉恐怖。差别实在太太大。

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张曼玉和马加爵这两个封面人物之间，并没有隔着一个注意力的鸿沟。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衷于娱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社会，关注时代进程。

创刊前，一位期刊专家给过一个不祥的判定：这样一份全面覆盖的杂志，很难有市场。但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设计，将视野拓展到广阔的空间。

没有人是摒除在外的，没有人不得入内。

我们的封面人物和重头报道既有各行各业的巅峰人物——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传媒精英、地产大亨、IT领袖，也有形形色色的边缘人物和底层人物以及被人忽略的个人和群体。

“记录我们的命运”、“他们影响时代”——创刊之初的两条广告语已经为这份杂志勾画出自己的肖像，明确了它的精神气质，它的价值取向，它的报道范畴。

后来的口号“重新打量每个生命”，针对的是媒体由来已久的对于人物的扁平化处理和人云亦云。

人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语、每一个表情、每一种姿态，都可能或远或近地对应着社会的经济的症候，对应着时代的和自身的情境。

我们想要做到的，就是不带偏见地挖掘这行为、话语、表情和姿态背后的国情和民情，希望与失望，梦想或野心。

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做成了一桩美好的事情——赢得那么多读者的热爱和信赖，这份热爱和信赖，是我们向着新目标迈进的动力。



请把这当成一封美丽的情书，它写的是“我”，写的是“你”，写的是一份杂志的情缘与使命。这么多年来，《南方人物周刊》仍旧在回应读者的热爱，记录我们的命运——为你，为我，千千万万遍。

亲爱的，虽然不必你动手回信，可否帮忙填个读者调研问卷？这次，我们想要记录你。

人物周刊

扫码完成南方人物周刊调研
幸运读者可获精美文创礼盒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维多利亚湖生死录

图 Frederic Noy-Panos 文 李艾霖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1

位于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的湖泊，世界第二大淡水湖，仅次于北美洲的苏必利尔湖。“复杂美丽的维多利亚湖生态系统，在环保主义者眼中丝毫不逊于伦勃朗的绘画，却永远地消逝了。”荷兰生物学家泰斯·戈尔德斯密特曾在这里从事研究，然后把这份遗憾写成了《达尔文的梦幻池塘：维多利亚湖上的悲剧》。

201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的《维多利亚湖盆地淡水生物多样性》报告称，维多利亚湖中有近20%的淡水生物面临着物种灭绝的风险。过度捕捞、水葫芦过度繁殖以及严重的工业污染依然是维多利亚湖盆地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最大原因。

自1950年代起，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尼罗河尖吻鲈被引入湖中，用以增加湖区渔业的产出。但是体形庞大的食肉鱼尖吻鲈繁衍迅速，疯狂吞噬本土的鱼类，至少有两百个鱼种自此灭绝。

另一主要入侵物种则是原产于南美洲的水葫芦。自1980年代开始在维多利亚湖传播，现在厚厚的水葫芦覆盖着湖岸，严重影响船只交通，掠夺水中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氧气，并为蚊子和其他疾病携带者提供了完美的繁殖地。



2

当地人大多依靠渔业产业链生存，数百万人靠湖吃湖，人口的日益增长也带来了过度的捕捞。近年来，乌干达派出军队打击非法捕鱼，坦桑尼亚政府也部署了警察和渔民巡逻队。尽管打击偷猎逐渐军事化，但非法的捕捞和交易仍然在法外之地继续着。

与此同时，非法的采砂作业也正在“报复性”地侵蚀着湖岸边的城市。未经处理的废料和垃圾被直接排入湖中，肯尼亚的基苏木、乌干达的恩德培和坎帕拉、坦桑尼亚的姆万扎和布科巴等地区都深受其害。

基苏木省省长彼得·安阳·尼永奥教授警告：“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否则在未来的50年里，维多利亚湖就会消亡。”

然而，维多利亚湖周边经济贫困，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9元——在这些每天需要为生存而斗争的人眼里，环境保护问题显得过于缥缈。

维多利亚湖看似可以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但其生态系统早已不堪重负。当地人虽也发现今时不同往日，但生态崩溃的毁灭性后果却几乎无人知晓。对于湖岸周边的政府而言，如何在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维多利亚湖的生态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显得迫在眉睫。



3



4

1.肯尼亚基苏木,凌晨5点,湖滩的风向转变,在水葫芦中吹出了一条通道,渔民趁机将渔船驶离岸边,外出捕鱼。据肯尼亚基苏木海洋和渔业研究所副所长克里斯托弗·乌拉博士介绍,在2018年1月,约10360公顷的湖泊被水葫芦覆盖,而一年后竟达到了1.7万公顷
2.乌干达恩德培,每逢周日,来自坎帕拉的各家各户都会来湖畔游泳。但这里的湖水容易使人感染血吸虫病,每年约有数万人因该病死亡

3.在维多利亚湖湿地的一个垃圾堆里,一名男子在清洗捡出的塑料袋,打算卖给回收者。蓝色袋子中的染料与沼泽中的水混合,最终进入湖中
4.乌干达津加,非法的采砂工人正在驳船和摇摇欲坠的木码头上劳作。这些沙子是他们在距湖岸12小时船程的纳马冈戈岛收获的



在面积只有2000平方米的米金戈岛上,有四五百位渔民生活在铁棚中。周围的水域有许多尼罗河鲈鱼,使该岛成为各家争夺的捕鱼点。在地理上,米金戈岛位于肯尼亚,距离乌干达边界约510米,但乌干达同样主张其领土权



在维多利亚湖的第二大岛布加拉岛附近,两名非法捕鱼的男子捕获一条尼罗河鲈鱼。岛上的同伙如果看到军事巡逻队靠近,就用手机通知他们逃离



乌干达卡森赛罗, 鱼市的工人用小卡车运回尼罗河鲈鱼, 用冰保存这些渔获。几天后, 卡车将满载着鲈鱼驶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鱼肉加工厂



在肯尼亚Ahero地区, 工人正在晾晒从鱼肉加工厂回收的鱼骨架, 晒干后将制成油炸小吃在市场上出售



肯尼亚基苏木,18岁的朱玛·柯林斯每天就坐在稻田中的小棚子里,驱赶觅食的小鸟。这个工作给他带来每月约578元的收入。这片稻田所在的地方曾是维多利亚湖的湿地



肯尼亚基苏木港口,结束一天工作的码头工人。他们刚搬运了数百袋肯尼亚生产的肥料,准备运往乌干达的棕榈种植园



棕榈种植园里,工人正在割叶。自从2005年油棕项目在乌干达启动以来,卡兰加拉群岛一直从中获利。15年来,该地区的家庭年收入增加了220万乌干达先令(约合人民币4200元)



乌干达津加,一位街头摄影师正等着潜在客户前来拍照。他在维多利亚湖边放了一张沙发和一面美国国旗



为了监测维多利亚湖的渔业状况,乌干达国家渔业资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定期对渔获进行测量和记录。
在工作结束后,团队成员会分享这些渔获



两名乌干达人民防卫部队的潜水员在维多利亚湖准备潜水,清理坎帕拉水厂的主要取水口。取水口经常被垃圾、渔网、木材阻塞。湖水经过水厂处理后,会分配给乌干达首都市区的240万居民



在往返于乌干达恩德培和塞塞群岛的渡轮甲板上,乘客要在烈日下晒足三个小时。往返于各港口和岛屿的渡船和其他船只,往往维修不善。由于没有救生衣,一旦发生事故就会造成严重伤亡



在维多利亚湖边的肯尼亚小镇,每天清晨都会有数十名妇女来此洗碗、洗衣服。而在数十米外,“饮用水”商人直接在湖边取水

CULTURE 文化

金雁 回顾青葱岁月

几年前,她开始写回忆文章,2020年春结集成《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出版。她一直认为,和自己从事的有关苏俄史、东欧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俄国知识分子等学术研究相比,这类随笔属于可有可无的“闲文”,没想到却受到了朋友和读者的肯定和在线追等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雨僧 rwyzz@126.com



66年人生里，大概没有哪一场雨，会比1994年北京城的那一场，让学者金雁更嗟悔和心痛。

那年金雁结束波兰的访学调进北京，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当时单位给她分的房子在北外附近一幢6层红砖房里。

因为空间狭窄，她把一些不常用的东西挪到了阳台上。谁料碰上一场瓢泼大雨，家里没人，门窗敞开，屋里淋得狼狈不堪。回家后，金雁急慌慌地抢救被雨打湿的书籍，却忽视了阳台上的旧物。很多天之后想起来再看，年轻时和父亲的通信、自己的日记早已发霉板结，笔迹掉色，晕染成一片片，无法挽救。

身为西北局干部子弟，金雁经历过票证时代的短缺经济，目睹了老辈人的公私合营，以及全家下放、从相对舒适的大院搬到干旱苦寒的甘肃定西。一系列政治运动、工农兵学员的光环与失落，统统都没落下。两代人的书信和日记成为历史的明证。

“起初并没有太往心里去，觉得当年那些幼稚的笔触、带有浓厚时代语言痕迹的东西价值不大，算不上什么太珍贵之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个体记录的感悟，每每想起来都会心痛不已。如果有这些文字材料作为辅助，帮助回忆就会准确容易得多。”金雁抱憾。

直到父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如今，金雁都常常会梦见，自己用电脑帮父亲抄写检讨。“我（在梦里）跟他说，有了这个东西就方便了，再也不用一遍遍地抄写、改正。那个时候稿纸改得真是一塌糊涂，因为你写的老通不过，明明自己没有的东西非要上纲上线，是非常痛苦的。”

遗憾不止一桩。父亲当年受到批判，金雁小时候经常听到议论，除了大环境使然，还有人性恶的一面作祟。等她想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父亲已经得了脑中风，丧失了语言功能。“再往后，我意识到，不是个人的问题。每个人都被罗织在一张网里，（出问题）只不过或早或晚。”

好在还有父亲从1938年到1978年整整40年的日记。几年前，她开始写回忆文章，2020年春结集成《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出版。她一直认为，和自己从事的有关苏俄史、东欧诸国

经济社会转轨、俄国知识分子等学术研究相比，这类随笔属于可有可无的“闲文”，没想到却受到了朋友和读者的肯定和在线追等。历史学者雷颐指出，虽然那些风波很多家庭都经历过，但金雁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亲历过西北局这个特殊历史机构，她从干部子弟到民间的历练与感悟颇为难得。“尤其年轻一代建议读，否则历史就（被）泛化了。”

“浊自浊清自清”

书中的第一张照片，是1960年代初金雁姥姥李彩绚和姥爷的合影。姥姥眉目清秀，简单的收领棉服和发式也盖不住五官的大气雅致。手自然地搭在腿上，眼里笑盈盈的，给人一种平静的力量。

但正是这位慈眉善目的姥姥，不断激起童年金雁的“叛逆性”和“革命警惕性”。

李彩绚的父亲李佩实是国内最早的民族企业家之一，1920年代经营皮革厂和布庄，后来来到天津发展，“据说中国的第一块机织线毯就是他的工厂纺织出来的。”姥爷是天津纺织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家里坐拥日据时代棉纺厂的木楼，花布沙发、冲水马桶不说，连碗盘都分米饭碗、面食碗、鱼盘、汤盆、水果盘。

在西北局大院长大的金雁，成长的环境再简单不过。“好像觉得世界上就红和白这两种颜色，到了姥姥家，呀，怎么还有这样的人？怎么还有这样的物件？”

1965年，金雁去天津治疗眼睛，住在姥姥家。那一年也是外孙女和老人的“博弈”之年。她不爱听姥姥给她讲述老辈创业发家的经历，反驳“还不是剥削得来的”；厌烦跟着姥姥去探望舅姥爷、姨姥姥之类的“资产阶级遗老遗少”，“居然有人称呼姥姥为‘大小姐’，听着别扭死了。”

姥姥告诉在外地的父亲，父亲写信批评金雁不尊重老人。但那个年份正高谈阶级斗争理论，11岁的金雁已经会用报纸语言顶撞父亲。“我父亲知道其实这些眼下时髦的东西，不是做人之根本。他不愿意我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但又不能告诉我，这是政治流行的宣

传语言。”左右为难的父亲，只好召回了金雁。

好些年之后，金雁才看懂了姥姥——不但是个很懂生活的女性，而且早已阅尽世态炎凉。当一些大字报把父亲“妖魔化”，连家人一时都难辨真伪，姥姥只淡淡地说了句：“我自己的女婿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世道再变，是非好坏不会变，浊自浊清自清，一个人的对错，岁月能够证明一切。”

金雁有三个舅舅三个姨，姥姥总能把每个小家都照顾周全。只要谁家大人缺位，她立马像“救火队员”一样出现在眼前，而且手里总像变魔术一般掏出一块奶糖、一把花生、几粒虾仁来。用姥姥的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金雁暗自惊讶，姥姥小小的个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虽然是“资产阶级大小姐”，但各类生活小窍门如数家珍：染过的衣物用盐水浸泡不易掉色，白球鞋刷过之后蒙上一层白纸晾晒不会泛黄，用白醋浸泡泛黄的浅色衣服可使颜色重新鲜亮。

有了姥姥这些结实的生活经验垫底，什么样的日子，金雁觉得都能对付了。

少年时，她爱上阅读和思考，来自父亲濡染；后来尝试画画、爱做手工，遇到大事不慌，爱笑，多少有姥姥的影子。跟着爱缝纫的姥姥久了，她学会了改衣服。“其实衣服改成什么样倒在其次，从坐下来拆、量、缝、熨的过程中，心一下子就能够沉下来，可以像旁观者一样把自己抽离出来，冷静而平和地看待问题。”衣服改完，心情也调整复位了。

小小“生命供给者”

采访那天，摄影师选中了金雁所在小区的一片石头景观作背景。只是，老有那么几袋施工留下的水泥袋，“不知趣”地和拍摄对象同框。摄影师正走过去想搬走水泥，穿着半截裙的金雁径直上前，把几十斤重的水泥袋徒手搬到几米开外。看着文文静静的女教授一点不含糊，让人一下想起了她笔下的陇西担水岁月。

1965年，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的金雁父



亲被发配到西北农村的基层生产队去“改造思想”。那年儿童节，金雁离开了从出生就厮混在一起的伙伴，和当时算得上舒适的大院生活，与家人一道迁往甘肃省的定西专区陇西县。

定西长年干旱、赤贫。她后来下乡插队的地方，老乡们早上起来洗脸都用碗，一共三口水，一口漱口，一口擦眼屎润脸，剩下一点搓搓手。那时整个陇西县城有六七眼长年不断水的方井，金雁他们家离每一眼井的距离都在一里路以上。父亲要去生产队“劳动锻炼”，母亲要上班，挑水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兄妹三人的肩上。

两个成年人用的大铁皮桶，装满水有七十斤重。桶大人小，走起路来晃晃悠悠。金雁通过观察和琢磨，发现挑水要用巧劲，“起身要稳，走路要扭，腰肢借着扁担摆动的节奏使劲。我还懂得水桶上有漂浮物，摇晃中的水就不易洒出去，于是夏天摘两个向日葵叶子，冬天放两块三合板。”

她自称是家里“70%的生命供给者”——因为课本里说，人体物质的构成70%以上是水分。

但比起后来在北部山区插队的弟弟，她已经算好很多。陇西北部要吃“窖水”：挖一眼窖，把雨水积攒起来沉淀后饮用。窖底积的水如黄泥汤，也被当成“活命水”。去看弟弟时，他给金

雁讲过一个故事：村里一个小伙子，盛了半碗干炒面，本来应该加水搓成块状吃，但他整个脸埋在碗里吃得急，竟让炒面给呛死了。

多年后境况改善，姐弟俩对水的态度大相径庭：金雁在家，洗衣服剩的水会留着再洗拖布，“恨不能上厕所都赶堆的，为的是少听一次那让人心疼的流水声”；弟弟却什么都可以省——就是不能省水，“见了水亲得跟什么似的，恨不能把上半辈子欠的水债全补上。我也能理解他，因为当年的生活烙印太深了。”

爹妈不在，自己当家。留着极短的运动头，脖子上挂着钥匙行走，用老人的话说，“像门后的笤帚一样，搁在一边就长大了。”

她跟着男生一起运煤，脱煤；和女生一起拾柴，“剥麻秆”（陇西种植亚麻，亚麻长成割下来先在池塘里沤几天，等纤维与茎秆剥离后便可剥麻）作引火材料。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地方，她照样学会了腌咸菜、做浆水（当地一种连汤带水的酸菜）、做搅团、补鞋，挑和身体等重的两桶水，去苗圃锄树苗，在河滩里装沙子，帮人糊信封、糊火柴盒或者拆棉纱……

父亲说过，艰难岁月中像男孩一样皮实泼辣一点好活。男孩一样的装扮给金雁添了一份生活所迫的“保护色”。而在异域旷野和汹汹而来的运

动里，她也锻炼出了不怯场、不轻易服输的个性。

甚至还培养起连父亲也不太擅长的技能：学会一口溜溜的当地方言，和乡民们打成一片。“随着局势变化，看着那些此前得意的外地人被批斗，本地人多少是有点幸灾乐祸的。我父亲是搞理论工作的，他不太能够在人际关系上打得火热，只是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当中。我母亲后来就要好得多。每次邻居们向妈妈要点边角纸张或喂鸡的落土粮食，她都尽可能地有求必应。巷子里的人都称呼我爸‘金老师’，叫我妈‘他金婶’。看似没区别，其实透着亲疏的。”

饥馑之困与供销之谜

父亲沦为“黑五类”，金雁兄妹虽然偶尔心底里无奈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拜和谐的家庭气氛和开放的教育所赐，不能读书的年代没有被完全荒废。随着生存能力和抗压力的生长，她也开始思考一些基本问题。

例如极度的贫苦究竟源于何处。在陇西她结识了一对姐弟，姐姐叫“改改”，大冬天光身板穿着一件烂棉袄，“她说她从来没穿过毛衣、没穿过袜子。弟弟坐在炕上，就是光身子光屁股，用一个小被子围起来，两个被角用一块砖头压住。”在她插队的生产队，光景最差的家庭，碗、盐都买不起。把盐化在瓶子里，吃饭的时候用筷子伸进去搅一下，在锅里涮一下，就算吃盐了。

虽然情况比改改家强得多，但在菜子公社插队的金雁也会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她曾和几个知青拿着口袋去向生产队借粮。几个人走了15里山路，好不容易拉了一口袋120斤饲料玉米回去。然而等到月亮爬出山坳，大家才看到玉米里有太多沙粒和小石头，没法下锅，还得先晾晒簸干净。

就着凉水嚼饲料玉米，有同伴抽泣哭出声来。已经心肠变硬的金雁没掉泪，脑子里反复盘旋着小饲养员的一句话：“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还怎么活人？”她心里犯起嘀咕：为什么所有人累死累活，就是养活不了自己呢？不论是期盼父



插队的日子 图/金雁

亲平反，还是指望招干招工，她还是存着“他日跳出农门”的念想。公社搞返销粮，可当地农民呢，他们种的粮食为何不够自己吃，有没有改善生活的一天？她陷入了困惑。

1972年，金雁被分配到离县城40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按1950年代初推行供销合作的初衷，它应当是农民自发的结社购销。然而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年代，供销社演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金雁所在的供销社是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相当于县商业局的分支，完全处于垄断地位。“农民自己种的米，养鸡下的蛋，都不能买卖，卖就是违法，必须送到供销社去。”

她回顾，“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供销社权限再次下放，‘文革’时期又第二次被收上来；1975年又与国营商业分离，变成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不过，两次‘下放’都不是真正恢复供销社的民营合作性质。农民的股份并没有恢复，供销社的经营更与他们无关，对屡次的‘折腾’也没有说法。”

金雁到供销社时，刚刚经历过“一打”（打击反革命活动）“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商业局是众矢之的，甚至有人因贪污罪自杀——多半是因为货物短缺一时说不清楚。

会计出纳们最怕的是盘点，以前每半年盘点一次，“一打三反”后改为每个季度都要进行一次账、货、钱“三清点的三讷”。社里规定这三项之间的误差率不能超过“个位数”，也就是10元以内。

对这个规定的“不近人情”，下面多有怨言，但都不敢提。一次，金雁在工作当中吃惊地发现，鞋帽组老实巴交的师傅，床下居然藏着一箱解放鞋、一箱帽子，价值大约在两百元左右。

“难道是私藏、贪污？”她犹豫半天，问起老营业员才得到答案：“在平时售货的过程中，大家都要让货物长出一点来——从顾客那里克扣出来。这已经成为不公开的惯例。”她这才明白，鞋帽组师傅的一箱鞋帽，是用来贴补盘点差额的。

“不近情理的苛刻盘点要用这类办法应付，不成了越反越腐了吗？”她有些迷惑，但也无处诉说自己的感受。但渐渐明白，不是所有的规矩都理据充分，不是所有的“违规”都该一棍子打死。

在商业局系统的那几年，金雁耳闻目睹了好些女性的风雨人生。在《五朵金花》这篇阅读量很高的文章里，她引为业务偶像的“算盘仙”A，与飞行中队长结婚，没想到贪污近两千元，获刑10年；年轻貌美的B被猥亵后与大自己20岁的男人速婚；风风火火的播音员、团委书记C先是公开为受侮辱的B出头，后来却又因为嫉妒心与其翻脸，“揭发”B的作风问题，还演出一场“见义勇为受伤，不料却是苦肉计自残博出名”的闹剧；D个性爽朗，是月琴、篮球高手，却冒天下之大不韪生下私生子；E有侠义和正气，指出C“英雄事件”的漏洞，是一片喧闹里难得的清醒女子。

因为和叙述对象比较熟悉，原型也都健在，金雁采用了半虚构的写法。

“你遇到这些女性时，自己还不到20岁。那时能明白那些人情世故吗？”

“好多事是后来才懂。当时商业局是（运动）‘重灾区’。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她们都是‘高颜值’女性。我那时小，又觉得那些运动是应该搞的，又觉得其实她们都是好人，有的还是我挺仰慕的人物。”金雁说。而雷颐从故事里读到的是，



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

为了生存，各家有自己的门路、本事，“这就是在建构很复杂的社会关系。”

对俄罗斯和东欧风云变幻保持关注

1977年，金雁考上了兰州大学历史系苏俄历史专业硕士。哥哥和弟弟也同时考上本科。一门三人同时“中举”，成为陇西县轰动一时的新闻。

滴水穿石。下乡的时候，金雁定期带着一个小木箱，只要回家便会换几本书，无非《鲁迅全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还有从老高中生那里搜罗来的俄罗斯小说，连高中的语文课本也反复摩挲了好多遍。本子则是自己裁切的纸张订成，读书笔记、书信、日记，什么都写。弟弟也时常拿食品去跟过去的老师换一些书，英文、数理化，拿起啥就读。没有功利心的求知，却为日后打下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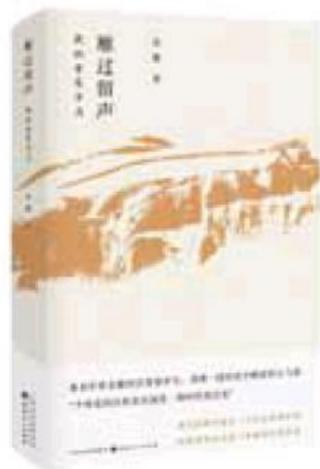
不过，各类“全集”连篇累牍，如何克服枯燥感？

金雁说，总是可以超脱一下现实。“毕竟把自己放在历史当中，可能还会好一点儿。后来我们也谈起，说在那个年代，又不像现在这样什么信息都了解。我们为什么还要表现？那就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因为你要抓住一个东西。不管它是虚无的还是别的什么，但有这个东西在，就比没有强。”

1990年代初在波兰访学期间，金雁透过自己的亲身观察，把东欧见闻带到国内。也实现了个人学术历程的转型：从研究一切“从哪里来”，加上“到哪里去”。“之前我觉得我跟时代一点冲突都没有，就沉浸在我的专业当中。后来才有了（研究转轨、关注现实的）自觉。后来有了一点感悟，也许我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给中国读者带来思考。”

从回国之后写就的《新饿乡纪程》《火凤凰与猫头鹰》《十年沧桑》《从东欧到新欧洲》，到后来获得学术、读者双重口碑的《倒转红轮》等著作，再到今天，金雁始终对俄罗斯和东欧诸国的风云变幻保持关注。

文学评论家李静是在1980年代末念的大学。她说自己所属的70后是最早进入庸常时代的一



代人，“再也没有大时代的轴心话语、轴心思想和轴心阅读，大家都比较分散，比较个人化和日常化，有点历史失焦的感觉。”她觉得幸运的是，那时受到过金雁、王小波等人思想观念的熏陶。“真正的思想烙印还是中国这些50后学者和作家给打下的。像金雁老师谈到的《路标文集》、路标学派，都给我很大的精神支撑。”

而在《雁过留声》这本里，李静感受到了作者蓬勃的生命力。“那时候人对于环境的耐受力 and 从中激发出来的生命力，是现在的人没有机会体会的。现在的人有点过于安全了，保护过度了，这是不好的。”

尽管如此，金雁认为，对逆境的抗争本身不能成为歌颂逆境的理由。

“你说回过头去，我要感谢和赞美那段生活吗？当然不要！”采访结束时，谈及此，金雁忽地肃然。“回忆和记录，是为了让人为阻断的历史不要失真，是为了我们不再犯错。”

按道理，此时的金雁是她自认为最好的时候。“想写的东西很多，再也不用被工作琐事纠缠，我特别喜欢资中筠先生说的一句话：我笔归我用。”

当欧洲一体化遭遇难民问题、民粹化，再到谁也无法把握的新冠疫情，当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未来会成何种走向？人类是否能够超越所谓激进与保守，去寻求真实的价值？金雁没有停止过观察和思考。

（参考资料：《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及该书线上读书会会议记录。感谢李占蒂对本文的帮助）



图/受访者提供

徐小斌

生于1953年。作家、编剧、画家、刻纸艺术家，主要作品有《羽蛇》《海火》《双鱼星座》等。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奖、第二届加拿大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英国笔会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译成英、意、日、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希腊、阿拉伯等文字，在海外发行。

徐小斌

理想主义的一颗棺材钉

熟悉徐小斌的人，能从她女巫般的写作里看出她的梦。1985年，她的中篇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里反复写到女主人公景焕的梦境：结冰的湖面，溶溶月色中泛着蓝幽幽的光，周围是低矮的灌木丛，女主独自一人滑冰，却永远在重复一个巨大的8字，无论如何无法脱轨……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发自北京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徐小斌是从我背后突然出现的，像高中生一样跳到我眼前：“嘿！”

我着实吓了一跳。手上捧着《羽蛇》，刚好翻到：“她眼里看到的東西，总和人家不一样。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问题后来屡屡暴露出来，变成她一生的倒霉事儿的真正缘起。譬如她看见窗外晾着衣裳在夜风里飘荡，就会觉得是一群没腿的人在跳舞；听见风吹蔷薇花的沙沙声就吓得哭起来，认定是有蛇在房子周围游动。在门口那个清澈见底的湖里，在有一些黄昏，她会看见湖底有一个巨大的蚌……”

眼前正是《羽蛇》的作者。齐刘海蘑菇头，白T恤搭一条宽大的黑色背带裤，戴着暗红墨镜——谁能想到这身装扮下是67岁的身体？

徐小斌说话的神情也像个充满好奇的年轻人。墨镜下是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谈到感兴趣的问题时，圆脸上的眼睛也瞪得溜圆，身体不自觉前倾，眼里放出光采。她感兴趣的话题包括《奇葩说》、发射SpaceX的马斯克、巴赫的赋格曲、埃舍尔、量子物理、薛定谔的猫、与人工智能恋爱……上一秒还在摇头说前夜的失眠和多梦，下一秒聊到因失眠而看的电影，立马激动起来：“欸我给你推荐个电影，可太好看了！”

话里带着北京大妞的味儿。推荐的电影是《脸庞，村庄》，新浪潮教母阿涅斯·瓦尔达和艺

术家JR共同执导的法国纪录片，拍的是一老一少两人行走法国村庄拍摄的事。再细看眼前人，徐小斌从发型个头到心气神色，还真有几分像阿涅斯·瓦尔达。

拍《脸庞，村庄》时瓦尔达90岁，徐小斌如今只小瓦尔达二十多岁——瓦尔达活成了她可望也可及的理想。她说起电影的神情全是欣羨，动情地重述自己发在社交平台上的话：“一米九和一米五的旅行。三十多岁和九十岁的旅行。智慧和创造力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旅行。令人叹为观止的旅行。JR拍了阿涅斯的眼睛、手和脚。那些皱纹、斑痕与毁伤，是深刻的美。”

我敢打赌，说这些话的徐小斌心里，也暗暗浮现了小个子的自己和一个年轻高大的浪漫艺术家同行的画面，哪怕心里知道那大概率无法实现。

梦

徐小斌坐下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失眠。采访前一夜，她又如同大多数时候一样，几乎一宿没睡。

徐小斌多梦，从小如此。

小时候她反复做的一个梦，是在一片蓝天白云的花园里，但所有鸟儿都飞不起来，一只只站在花上。徐小斌在花园里，一抓就是一大把小鸟，然后把它们都放进自己的口袋，直到口袋鼓

鼓囊囊再也装不下。

有睡着时的梦，也有醒着的白日梦。她打小就有奇思异想：“徜徉在月夜的海滩，我会想象着有一个手持星形水晶的马头鱼尾怪物正在大海里慢慢升起；走进博物馆，我会突然感到那所有的雕像都一下子变得透明，像蜡烛一样在一座空荡荡的石头房子里燃烧……”

有时，她分不清梦里梦外：夜里醒来，见床头立着一张妈妈的剪影，纸片一样薄，是梦还是现实？但这记忆如此深刻，她着实被吓得不轻。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体验，成了她后来作品里神秘主义的影子。

有时，幻想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她尝到过幻想的甜头，比如在黑龙江上山下乡，冬天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农田里劳动，是幻想支撑着她一天天熬过去。那时没有煤烧，她们就跑到雪地里扒豆秸，很高的一垛豆秸也只够烧一炉，所有人就围在那炉边，起哄让徐小斌讲故事。讲到后来，徐小斌把以前看过的故事都讲完了，只好开始编故事。

后来想起，徐小斌常觉得，那就是她写小说的起源。那个年代，那是知青们仅有的一点精神生活。期间，她写下了自己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洋洋洒洒十万字的小小说《雏鹰奋翮》，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抄在本子上，私底下被大家传阅。

无论白天劳动多累，徐小斌还是睡不着，还是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某种程度上，梦承载着徐小斌的灵性——

结婚后，梦少了，在她看来，那种所谓灵性的东西似乎也莫名消散。离婚后，梦又回来了。婚姻和女人的灵性之间难道存在某种必然关系？她摇头，又暗暗点头，说大概是。

熟悉徐小斌的人，能从她女巫般的写作里看出她的梦。1985年，她的中篇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里反复写到女主人公景焕的梦境：结冰的湖面，溶溶月色中泛着蓝幽幽的光，周围是低矮的灌木丛，女主独自一人滑冰，却永远在重复一个巨大的8字，无论如何无法脱轨……

那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弧光》，成了让徐小斌在80年代小有名气的代表作之一。在80年代初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的主流中，徐小斌先人一步，开始书写现代人的困境——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里，女主景焕最后透露逼疯自己的竟然不是常人以为的家庭阴影，亦非情场失意，而是自己每天面对账本上如巫符般的数字，是无意义的枯燥重复工作本身。

用故事解构正常与不正常的边界，质询理想与疯狂的界限，正如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的评价：“徐小斌的作品不仅仅关乎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乎整个现代社会与现代生存。”

缺

徐小斌的小说也像许多梦重叠在一起，每个梦都色彩浓烈。不同梦境的色彩叠加渗透，彼此氤氲浸染出了一块近乎魔幻的调色板，结构成了一座立体迷宫。





迷宫的出路是形形色色女性的命运。有人繁华一时却孤寂一世，有人执着虚荣也为虚荣所困，有人毕生寻爱终被辜负，有人长袖善舞处处逢迎，有人守着纯粹自我毁灭，也有人万般无所谓只求潇洒。描述了五代女性命运的《羽蛇》，横跨清末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百年女性历史，是此中种种魔幻瑰丽的最好脚本。那里面多多少少有徐小斌自己和她家族的影子。

徐小斌是家中的三女，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她本是家里最受宠的幺女，但随着弟弟的出生，一切都变了。《羽蛇》里有一个细节是她的亲身经历：弟弟刚出生时，她出于好奇按了一下婴儿软塌塌的鼻子，顿时引来母亲暴怒，一脸嫌弃地将她推开。

敏感而早慧的徐小斌立马明白了自己在母亲心里地位的变化。她无法理解，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母亲为何有如此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为何会说出那些难听的话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

那些话像刀子一样割在徐小斌心上，许多年后又刻印在稿纸上，成了她几乎一生都在隐隐作痛的伤疤。尽管徐小斌从小到大都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每次带回奖状，母亲几

大学三年级发第一篇小说 图/受访者提供

乎看也不看一眼。类似的情节在《羽蛇》里，是女主羽在学校画了一幅绝美的蓝色雪花，本想“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画还没送出，弟弟出生了，没人在乎羽在哪里——最后，那幅画皱巴巴躺在垃圾桶里，被大雪覆盖。

“你问我现在原谅了我妈吗？”徐小斌压低了声音，凑近了摇头，“说实话，没有。”

“所有的孩子被母亲抛弃的结果，是伴随恐惧流浪终生”，徐小斌常说的这句话是她自己的写照。她了然自己人性中阴暗与欲念的角落，诚实地面对与书写，却不固宥于此，而是超脱到幻异的异地，在小说里寻找唯一、精神性、纯粹的灵魂寄托之所——有时，它们以爱情的面貌出现，有时则是某种带着神秘色彩的信仰领地。

好在还有父亲的爱，让徐小斌不至完全心理失衡。

父亲总是支撑她的那个人：当年叛逆的她为了离开家庭自愿报名上山下乡，16岁瞒着家人跑去销了北京户口，被分配到黑龙江的农场，家人到火车站送别时，是不舍的父亲给她买了一大袋冰棍；后来徐小斌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某兵团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还是父亲千里迢迢赶来，打地铺睡在师长办公室门口，苦苦恳求师长破例把女儿转插到北京郊区；80年代徐小斌在《北京文学》《十月》《收获》发表小说，也是父亲最为她骄傲。

年轻时的徐小斌心里总向往那种瞬间绚烂的永恒，哪怕以自我毁灭为代价。她的小说里常出现两条路的抉择：一条是幸福的世俗之路，一生没有大起大落，平淡喜乐；另一条是波澜壮阔、或可名垂青史之路，但生前惨淡崎岖，寂寞孤苦。

早些年，徐小斌笔下的主角总是选那条崎岖壮阔的道，精神和灵魂高于肉体，就像《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结尾，景焕试图脱轨掉入冰湖，死前却看到了最美的弧光。反反复复，本质上都是《海的女儿》的故事——人鱼公主为了救王子失去了声音、忍受行于陆地步步如刀割的痛苦，然而王子醒来后却误认他人为救命恩人，

人鱼公主重归大海时，看到了阳光下闪耀着的最美的泡沫……

这是徐小斌七岁时，父亲讲给她的安徒生童话。

迷

在处世之道上，徐小斌有一种和年龄不相符的纯真，或者说执拗。她到五六十岁的年纪也没学会圆滑，十几年前，也因此遭遇了痛苦的精神危机。

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正是中国经济大潮涌起之时，文学渐渐式微。徐小斌犹记得自己80年代发表小说时，无论是《请收下这束鲜花》《河两岸是生命之树》还是《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都能收到上百封全国读者的来信，字里行间表达终遇知音之感激、探讨对小说情节的理解、分享对人物的爱憎。

她也怀念那时人人读尼采、海德格尔、萨特，讨论文学哲学与人生，怀念80年代的北大——自从“文革”结束后考上中央财经学院，她就成了个“不安分的学生”，几乎每周都骑着破车往北大跑，一周至少两三次，蹭各种讲座，比如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袁行霈的诗歌讲座。“那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向我们打开一道门缝，所以门外的景色也就格外鲜艳夺目。”

现在想起80年代的种种，徐小斌多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当年，无门无路的无名作者仅凭投稿到编辑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竟然能够得到认可——1983年，她在宗璞的鼓励下把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寄到《收获》杂志社，一周内就接到了去上海改稿的电报。她津津乐道于第一次去《收获》编辑部的故事：编辑郭卓老师手持《收获》为接头暗号在车站等她，上了编辑部的楼梯边走边喊：“接来了，是女的！”

也是那次，她在巴金女儿、《收获》时任主编李小林家中见到了巴老。“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蔼的笑容，尽管内心充满崇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一句通常的问候也说不出——不知为什么那时我觉得凡心里的话表达出来就会变味



1996年，芝加哥，徐小斌与画家周氏兄弟
2011年，徐小斌与莫言在首届中澳论坛
图/受访者提供

儿——尽管那一年我已年届三十，但心理年龄上却缺乏一个成长期，人情世故方面基本为零，甚至负数。”

市场经济席卷而来之后，她愈发显得格格不入——本来在那个年代她的所思所想已经够格格不入了。

“2006、2007年那会儿，让你痛苦的究竟是什么？资本？市场？”

她摇摇头，说了两个字：“关系。”

“我始终认为世上的人大抵分为两种，有灵魂的和没有灵魂的。有灵魂的人就有痛苦，而没有灵魂的人，既无前生又无来世，是一群注定在今生一次性消费的人，这样的人群其实十分可怕。他们混迹于茫茫人海之中，无信仰，无道德底线，更无自省精神，他们有的只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能够达到这些欲望的手段，他们混淆了视听，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极端蔑视任意践踏，对于世间的物质巧取豪夺贪婪索取，如果这样的人再攫取了作家的头衔，那便是大不幸了。但更不幸的是，这个时代恰恰提供了滋生和繁殖这种人的肥沃土壤。

最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来信问，《羽蛇》的卷首语‘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

性’，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我说，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早已堕落成为一个物质世界，而失去了它的精神世界，也就是灵魂。而这个‘我’，其实是一个大我，也可以说是具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女性，实际上长期受着难以忍受的戕害（也许已经麻木了）——这戕害或许来自整个男权世界——作为中国女性的最本质的‘性’，早已迷失了。”

拗

80年代末有一段时间，徐小斌苦闷至极，常常呆坐半天一字未动，只好拾起“女红”，打毛衣、做衣裳。

有一天，她无意中用铅笔刀把一张黑色废纸刻成一个黑女人，衬在白纸上，竟别有韵味，于是一头钻进了刻纸艺术。1990年，有绘画基础的徐小斌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了她的刻纸艺术展。喜爱民间艺术的艾青摇轮椅而来，细看了全部作品，对她说：“你这每一幅都是原创，想法很独特，应当拿去发表啊。”

黑纸白孔的宇宙给了她暂时的休憩。

徐小斌的正职是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电视剧要平衡大众、市场、资本等各方力

量，个中关系错综复杂。为《弧光》选角时，导演特意带一位女演员与徐小斌一同进餐，百般暗示她女主角的人选，她愣是没听出来，还在绞尽脑汁搜寻自己认为适合的形象。

她还有一项棘手的日常工作：与想从剧本中捞油水的关系户打交道，出面当“坏人”劝退他们。只要涉及文学和剧本，她以前总会不留情面地直说哪里不好，劈头盖脸，不怕得罪人，对各种明示暗示的利益嗤之以鼻。文学评论者胡行舟的观察让她深以为然：她的作品表面看似充满神秘主义的巫气，骨子里却极其典正雅丽。

后来，徐小斌把自己在编剧行业中看到的种种世间怪相糅进了中篇小说《入戏》里，令人啼笑皆非又有几分心酸——了解徐小斌经历的人，大概能猜到有几份是在写她自己。她明明是行业的局内人，却总像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在周遭视她为“不识进退”的“失败者”时，她仍要在结尾里写：“这世界，一定有另一种终结。”

可时光到底是会改变一个人的。67岁的徐小斌还是没学会世故，但好歹学会了迂回和委婉，懂得了“或许不用这么直接”。

“但你骨子里妥协了吗？”

“没有。不可能的。”她笃定而迅速地摇头，继而大笑起来。

在令人怀念的80年代，她曾认识一位在演讲台上慷慨激昂、逻辑清晰的北大男生，她开玩笑说他是“理想主义的最后一颗棺材钉”。然而她知道，自己又何尝不是另外一颗？

这股执拗，让她至今还在用写作自我折磨，深刻地领受着写作带给她的“销魂的酷刑，极乐的苦痛”。她想，这大概就是她的命。 ■

（参考资料：徐小斌《羽蛇》《德龄公主》《炼狱之花》《海火》《迷幻花园》《蜂后》《别人》《入戏》《密语》《夜谭》等作品，陈晓明《梦想成精——徐小斌的小说世界》，戴锦华《自我缠绕的〈迷幻花园〉——阅读徐小斌》，《徐小斌：八十年代琐记》，胡行舟《女王的两个身体——徐小斌素描》等，感谢作家出版社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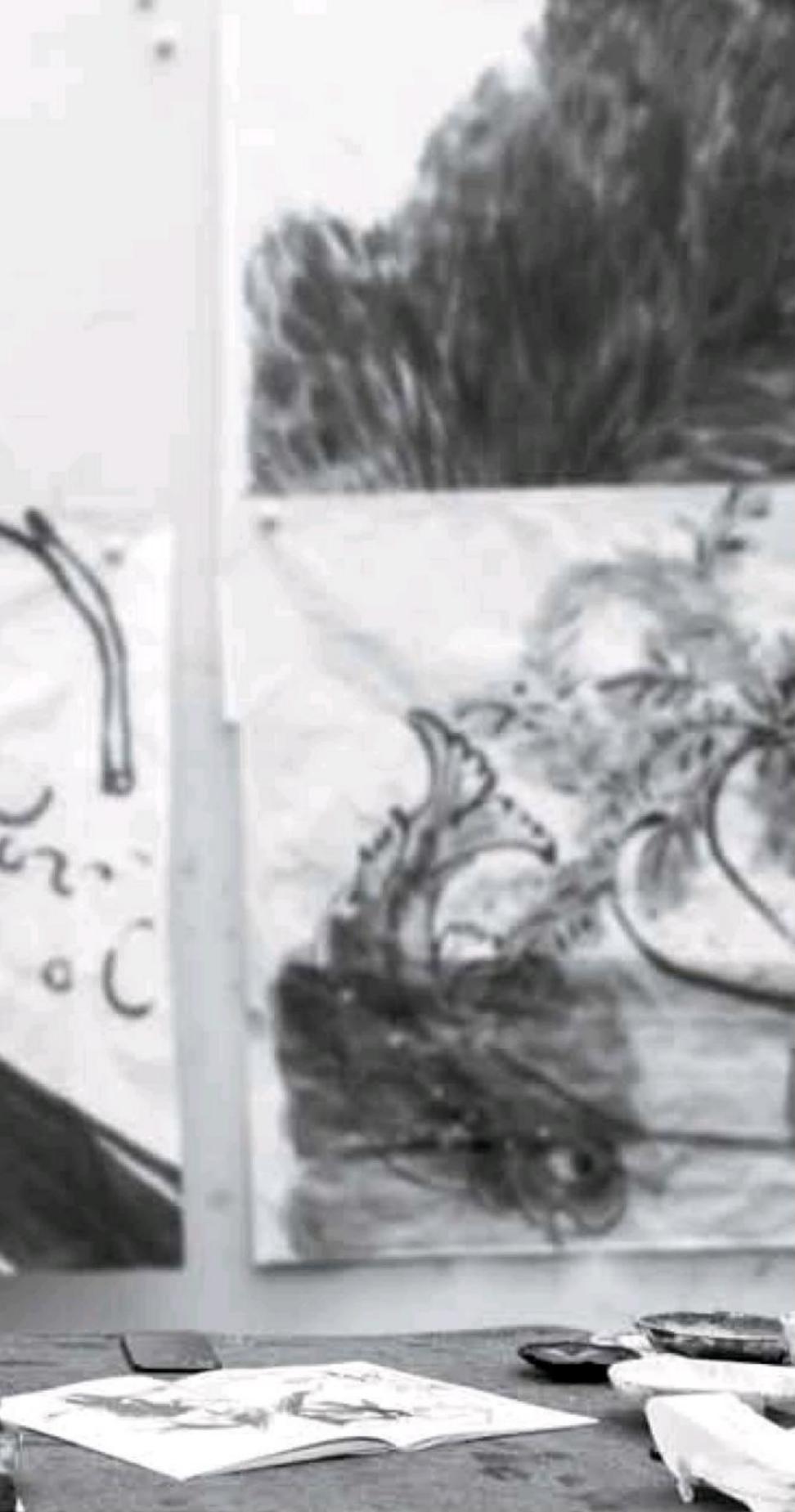


梁缨 画到一定年纪，你笔下就出鬼了

“你画得可不像黄胄”到底是一句怎样的评价呢？赞美还是贬抑？“我父亲从来没见过学生要像他，他说一个人应该有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不希望我像他。”

春节期间在家看电视，看到舞狮和木偶戏，很吃惊，她第一次想到，威风凛凛的舞狮，也不过是一张皮子。她马上画了与之相关的作品。提线木偶的哀乐跳俯都身不由己，几根丝线，被一股更大的、隐藏的力量所控制和支配，灰色的水墨漩涡里是木偶面无表情的脸。金毛狮被腹中的小人掌控着，而它上面也悬着许多丝线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苏州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图/受访者提供

梅雨季节，平江府的半园水汽氤氲，梁缨不要空调，宁可坐在园子里，夏日暑气配上空气里几乎肉眼可见的水分，对于从干燥之地北京过来的人，如同一场小型桑拿。四周的园林也让她想起父亲带她在江南一带写生的往事。一晃，四十年了。

“那时候我陪父亲在苏州、杭州一带，当时苏州用直好多小姑娘还戴着包头围巾，穿蓝布褂，很别致的水乡服饰，我父亲画了好多用直妇女。”在江南的记忆是软糯的，但黄胄却因此对女儿说：江南过于甜美，易消磨斗志，不宜少年人求学。本来想报考浙江美术学院的梁缨因此去了广美，再后来去了德国。

现在的苏州姑娘不复当年模样，在苏州博物馆的展厅外，女孩把脸蛋塞进梁缨画作设计成的互动装置里，变身金毛狮的模样，笑嘻嘻自拍。梁缨在苏博的个展《金毛狮，一张皮》，原定展期4月，因为疫情延迟到了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开幕。也因为疫情，开幕式押后到6月补办，“再来就得直接改闭幕式相见了。”她刚想一乐，手机上又传来了北京新发地疫情的新闻，“咱们这别又刚一出京就回不去了吧？”

展厅里最大的几幅作品，都是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完成的。长达三米六的《孤独舞台》，金毛狮置身蓝色莽原，表演者还在擎着炫色毛皮，张牙舞爪，不合时宜地虚张声势，本该是喜庆场合的演出，但此刻四下空空荡荡无人喝彩，威风凛凛的狮子，置身巨大的空间背景之中，顿时显得如同玩偶，群山险峻，脚下履冰。“这种孤独和被隔绝的情绪，肯定也是受了疫情的刺激。”

你怎么画都行，就是别像黄胄

身为大师的后代，有一个显著的困惑，就是人们总会在你身上寻找你的父辈。“你画得可不像黄胄”到底是一句怎样的评价呢？是应该理解为赞美？质疑？还是贬抑？有时候，光环之下，这些所谓的“艺二代”要用一生来重新确立自我的身份。

“中国传统水墨画里相对重视师承观念，所以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你画得不像你父亲？你就有点叛逆，离经叛道，你就没把好的传统给延续下去，到你这儿，就断根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说过学生要像他，反而他说的是，我的学生要是像我，那他就没出息，一个人应该有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不希望我像他。”

梁缨一直记得她在广美学习的时候，同学和老师都挺照顾她，但她最怵的72小时素描课，画着画着就露破绽了，老师们瞅瞅画，再瞅瞅她，眼神就有点狐疑：就这，还黄胄女儿哪？

黄胄很宠爱这个小女儿，到哪里参加活动和写生都带着她。黄胄老说，你要有心学，你就在边上看。但他甚少直接指点。除了父亲是

国画大师，梁缨的母亲也善画，师从中国第一代油画家吕斯百。梁缨从小浸淫在浓厚的艺术氛围里，家中往来无白丁，李可染、李苦禅、吴作人这些大画家都是可把臂同游的常客。黄胄家藏甚丰，她可以直接搬出龚贤、任伯年、陈老莲的原作来临摹。

梁缨 15 岁开始习画，那一年正值“文革”结束，被十年浩劫中断了创作生涯的黄胄也可以相对从容地重拾画笔，但“文革”中积累下来的旧疾发作，一年后，他陷入瘫痪。邓小平访日时送给裕仁天皇的国礼——20 米长的《百驴图》，就是黄胄在病榻上完成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父亲画得好，我跟他去新疆写生，你看他画的新疆姑娘，美丽的眼睛那么瞥一下，多漂亮。他画塔吉克姑娘跳舞，连抖动肩膀的样子都能给画出来。那时候我当然想画得跟他一样好。”照母亲郑闻慧的说法，梁缨在出国前，已经能画得很像黄胄了。

梁缨说，是到了德国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在审美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和父亲之间渐渐出现了分野。当时同在德国汉堡美术学院读书的，还有大画家 Sigmar Polke 的儿子，他们俩在同学眼里，都是背负着巨大阴影的人。

梁缨就读的是自由艺术系，这个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找老师，也鼓励各种不同形式的媒材探索。阴影之下的人如何找到自由？她没完没了地看各种展览，兴之所至地尝试了各种艺术形式：版画、丝网、陶瓷、摄影……“除了木刻没玩过，别的都玩儿了一遍。”

当时正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好年华，她去看巴塞利兹的展览，巨大的空白上面几个黑点，“当时我看着完全就是中国的水墨黑白画。咱们水墨还讲个墨分五色，还得有个形象，他啥都没有，就几个黑点子。”她站在展厅里犯嘀咕，这画好在哪儿？为什么人家名气那么大？“大师落笔都很肯定，永远不会有模棱两可的线条，这个不分中西。”

德国的老师都很鼓励她的水墨探索。一次假期，同学们都走光了，她一个人留在学校，用元书纸和在山西买的糊窗户纸，涂涂画画，



算是用绘画作日记，画了一堆，教授看见了，大加赞赏。她一下子醍醐灌顶：原来这也可以是艺术。

题材自由，媒介自由，风格自由，自由艺术系把“黄胄女儿”变回了“梁缨”。在德国没有裱画师傅，水墨画无法托底装裱，她就入乡随俗地画在帆布上。回到国内，发现父亲留下了大量上好的老纸，于是又画回宣纸，“宣纸其实是非常好的媒介，它的包容性很强，可以跟很多材料融合。”绢可以洗，可以修改，但宣纸不行，宣纸会如实反映上面发生过的一切。梁缨在宣纸上用丙烯，用综合材料，做拼贴，浓墨重彩，毫无藩篱感。黄胄画鸡，画鹅，她也画，梁缨画的鸡是桃红色的，跟传统写意花鸟就算有关系也绝对是远亲，取名《小粉红》。

主佛旁边的小仙，才是自由作文

此次苏博展厅里最大的一幅作品，《纵然生

得好皮囊，腹中原来草莽》，也是一次意外的拼贴作品。梁缨有“练线”的习惯，传统水墨训练之中，画家对线条的抽象和控制能力尤为关键。她常常会画一些大尺幅的作品，用放大的形体来锤炼对线条的把握。每年春节买得年花，就开始画六尺的大画，水仙笔直的长叶子尤其适合练线，每朵花都得有小脸盆子那么大。今年过年她在家临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水浒叶子》原本不过是案头把玩的尺寸，被她画成了真人大小，她在工作室里张挂起来反复打量和实验，最后索性把它们拼贴成巨幅作品。

“我在画面里面拼贴了许多图示，比如沈周的竹林，比如右上角的鬼脸，其实是来自西藏的壁画，有些平时练习的时候画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种素材，把它拼进一个故事里头，产生了另外一种效果。”画面的最下方有一张巨大的熊皮，那也是她临任伯年的作品，作为单幅作品不太满意，拼贴进去倒也觉得浑成。

“皮相”在梁缨的创作中也是不时出现的命

题，之前她就画过西洋的兽皮地毯，那种厚嘟嘟带绒的质感用中国水墨来表现是极为过瘾的。“外国有一种地毯，是把整个兽皮给卸了，但是保留兽头。我画过一个狗皮毯子，整个那么摊开在会议桌上，旁边都是椅子。我还画过一个裸体的人正在针灸拔火罐，底下是一张破了的皮子，人的肉身上也都是红点和针眼。他们说我的画老变，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延续性在里面。比如我对皮毛的兴趣，其实就是你的才智和笔法，要跟你想表现的东西相匹配。”

春节期间在家看电视，看到舞狮和木偶戏，她很吃惊，她第一次想到，威风凛凛的舞狮，也不过是一张皮子。她马上画了与之相关的作品。提线木偶的哀乐跳俯都身不由己，几根丝线，被一股更大的、隐藏的力量所控制和支配，灰色的水墨漩涡里是木偶面无表情的脸。金毛狮被腹中的小人掌控着，而它上面也悬着许多丝线。

梁缨爱画仙人神鬼，学画之初，就对北魏壁画和砖画发生兴趣，少女时代跑去敦煌写生，隋唐的窟都懒得看，专奔着北魏的窟，现在想来都是不复再有的奢侈：坐在特窟里对着飞天画写生，满天仙女乱飞，诸神复活。“只是那时候敦煌的水质太差，去了一开始准得闹肚子，

左图：德国留学时期的梁缨 图/受访者提供
右图：苏州博物馆，梁缨个展展厅



画着画着就得丢下本子往外跑。”

她去法海寺看壁画，去山西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却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小庙里看佛造像，尤其喜欢看主佛旁边那些天王、护法，小仙小鬼儿。历朝历代，主佛都有固定制式，都是命题作文。反倒是旁边那些次要的罗汉、夜叉、力士，仿佛自由作文，充分流露出工匠的性情和想象力。

画成你自己

父亲晚年创办的炎黄艺术馆，现在也是梁缨在日常主持。艺术馆按父亲的初衷，传播传统文化和民族美术，梁缨自己的作品，不在艺术馆做展览。随着年龄渐大，她越来越理解了父亲，也在自己身上不断看到父亲。“我的性格像我父亲，但是他特别勤奋，我就比较懒散。”“文革”时期，一家人被拆成几处，父亲为了来探视三个孩子，早上4点钟就起床赶路，为的是8点就能见到孩子，把他们带去前门玩耍。黄胄一生手不停笔不停，但是他画过的无数速写，存世的却只有五百幅左右，其余的，都被画家本人流着眼泪成筐成筐地烧掉了。

黄胄说过，“还是改革开放好。24小时可以画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算算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真正画画的时间，也就五六年时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抓紧时间，珍惜大好时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美术史上，黄胄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跟徐悲鸿他们不同，黄胄没有留洋的经验，他和妻子郑闻慧对西方美术的理解都来自二手经验——黄胄的老师韩乐然、司徒乔，郑闻慧的老师吕斯百都是留法的，他们带回了法国后期印象派乃至生活主义的神韵。

“我父亲当时还是一个北漂，拜在赵望云门下。当时徒弟要在师傅家吃住，赵望云家也得多吃多只碗，正好韩乐然要去八百里秦川做地下党工作，需要一个人帮着扛扛画架子什么的，安排父亲跟了去。韩乐然教了我爸不少东西。韩乐然喜欢油画，主张我爸学油画。我爸这人从小爱国心比较盛，就不愿意学洋人那一套。其实他西洋的那部分受益于好几个老师，影响他最大的是司徒乔。”



1



2



3



4

- 1.《青绿山,洞中仙》175cm×95cm 纸本设色 2018
- 2.《尧舜不牧羊》96cm×178cm 纸本设色 2019
- 3.《金毛狮,一张皮》122cm×141cm 纸本设色 2019
- 4.《仙路振纓》96cm×180cm×3 纸本设色 2019

梁纓说,当时的文化氛围相当多元,《雍华》杂志出了十期,其中有八期都是父亲一人独挑大梁,又当记者,又画插图:黄泛区的毛笔速写、工厂写生和戏剧速写、木刻版画,还有关于艾森豪威尔的时政漫画……足以说明黄胄在艺术上的营养来源和能力,是多方面的。“我父亲肯定受到过西方艺术的熏陶,但是是潜移默化的,加上他的爱国心,他嘴上是不会这么说的。就像他爱时髦,买了名牌表带,把皮带头的标志抠掉,换上一块玉遮着。买了国外的名牌衣服,也非得把商标剪了,跟人说是国产的。当时香港导演李翰祥就说,黄胄你这件衣服这么高级,绝对不可能是国产的,当场把他衣服脱下来检查,最后在夹缝里找到马脚:法国 Dior 的!”

但黄胄最为人称道的艺术成就,恰恰是他的融贯中西。徐悲鸿把油画的块面感、体积感带进了国画,黄胄把西方素描的线条感带入了国画,尤其是速写般复线的灵动使用,充满胆气,让画面人物充满动感。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找到东方的位置,这是他们这一代人难以回避的命题。这个命题到梁纓这一代仍然没有结束。

“我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才渐渐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有了一定的成熟度。就像李可染说的:画到一定的岁数,笔下就出鬼了!虽然年轻时也能画出好画来,但那都是灵光一现的东西,跟你本身关系不大。因为之前你的自我认知、你的思想意识都不稳定,你就会很纠结。现在我只担心自己画油了,我就提醒自己,你别画得那么顺,你要保持一点障碍,保持一点生,才能找到自己。”

她再不怕模仿父亲了,会直接临父亲的画册,如果不怕麻烦,还会去炎黄艺术馆的库里搬出父亲的原作。因为她已经有足够的笃定,甭管怎么临,她还能画成梁纓。 

STAR 明星



达达乐队 永远对一件事情保持天真

本刊记者 孟依依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图/受访者提供

达达刚解散时，彭坦想放弃音乐又苦于没有其他出路，游荡了一阵子，在音乐节上听到Supergrass乐队唱出《Moving》第一句“Moving, just keep moving”时，如大梦初醒一般决定继续做音乐

达达乐队决定做一首新歌，在正式宣布解散的第14年。

第一天，在北京亚运村一个地下排练室，他们先花了很多时间来聊天。主唱彭坦是有意把排练节奏放慢的，在分别多年后，“大家首先要成为音乐上的好朋友。”

吉他手吴涛选中了一段产自2018年的吉他动机（乐段内部可划分的最小组成单位，是乐曲发展的胚芽）。那是2018年新年，因为难得乐队四人都回武汉过年，彭坦便找到一个排练室，叫上大家排练了三天，老歌交替期间诞生了几组新动机，而其中一组温和、抒情，适合重逢。

由动机发展出框架，经过收拾整理、完善细节、优化，歌曲完成。那么，歌名呢？

黄金时代

2000年前后，武汉的乐队往往分成两大派：重金属，或者朋克。尤其后者更有名，比如生命之饼。

达达都不是。还在人异乐队（达达成立前，彭坦和贝斯手魏飞所在的另一支乐队，意为“现代人都异化”，解散后他们俩成立达达）时期，彭坦试图和两大流派套近乎，他拿出自己新买的罗兰VS840录音机帮他们录母带，但朋克和重金属维持了他们一贯的作风。

后来，鼓手张明和吉他手吴涛看中达达的不同，加入乐队。

2000年，他们把积攒的几首歌拿出来，准备录制几百张唱片和磁带，取名《天使》，带去全国



各地巡演。在武汉演出的时候，其中一张《天使》传到了华纳唱片高层宋柯、许晓峰手中，二人听过后当即拍板，随后马上飞到武汉与乐队接触。

2000年7月1日，达达乐队与华纳签约。在武汉音乐学院的签约仪式上，老狼、朴树等音乐人也一同出席。

签约后，达达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签约全球五大唱片公司的中国摇滚乐队。在此之前，中国的摇滚乐队大多是叛逆、愤怒，宣告反抗，并生着消亡与生长两种力量。而达达——至少从最后呈现出的效果来讲——是阳光、活泼，相对平易近人的。

他们从武汉来到北京，原本打算地下发行的专辑《天使》经重新制作，于2001年1月上架。接下来的半年内，达达乐队与窦唯、许巍一同参加西安摇滚演唱会，获得了来自电台、榜单的17项音乐奖项，单曲《等待》由香港华娱电视投资港币近七位数赴港拍摄Video，然后接下IBM、MM豆等代言。

彭坦有干净的嗓音，吴涛有跳脱习惯的吉他，魏飞有温和的贝斯，张明有势大力沉的鼓。他们浑身充满活力，急促得甚至奔跑起来。

到北京之后，吴涛觉得有了不错的平台，张明准备大展身手，彭坦却陷入不知所措。

“（《天使》）里头接近一半的歌其实都是有愤怒元素的，《暴雨》是很愤怒的，《毛病》是很痛

苦的，《玩偶》是很戏谑的，《荒诞》也是很暴躁的，包括最早写出《节日快乐》这首歌，其实也是源于一个讽刺，讽刺那种少不经事的傻快乐。但是没想到这首歌video拍完，整个宣传出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大家是一个误读，好像真的在唱节日快乐，‘祝大家节日快乐’，然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好像跑题了。”

《天使》被误解，便想在《黄金时代》中证明自己，达达四人花了三年时间，从40首歌曲中挑选出11首，由彭坦、吴涛自己担任制作人，从下午进录音棚忙到深夜，不断录、改、录。

专辑完成后有几个月时间，他们觉得一切充满了希望。可是不像《天使》，《黄金时代》的反馈来得慢且不理想。

它比《天使》内敛，“没有《我的天使》《节日快乐》那种特别少年、冲劲、比较轻松的歌”。取而代之的是专辑同名单曲里唱的那样——不知道是因为害怕些什么 / 或是觉得它还不够真诚的 / 面对这黑夜支撑着天空 / 我开始变得安静了 / 从前会去呐喊的 / 从前会去愤怒的 / 对着眼前黑色支撑的天空 / 我突然只有沉默了。

到后来，魏飞说：“也不知道我们改变到底是对是错。本来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的一张专辑，到后来我们自己都有点犹豫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消化，在那几年时间里，彭坦没有和公司以外的人交过朋友。加之华纳公

司人员变动，许晓峰离职，达达乐队的排练、活动减少，低迷的气氛逐渐积累。

2005年，在鼎盛时期，达达乐队宣布解散。

Song F

因为觉得即使组起新乐队也无法超越达达所为，吴涛转向音乐制作，与更年轻的乐队一起完成作品。他乐于如此，也正好满足他的乐队情结。

有时候他觉得音乐是一种记录，“不管是对这个时代，还是对于个人。”

达达成立初期成员来来去去，吴涛是最后加入的。乐队解散后他把在乐队使用的那把电吉他放进琴盒，之后无论是与其他音乐人还是与彭坦合作，他都没有用过那把琴，91年产的Fender，他的第一把电吉他。

张明在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做乐手，偶尔去录音棚帮打一次鼓，拿1000到1500元酬劳，当然这样的机会不多，有半年时间他也给朋友公司写剧本。

生活很快变得乏味并且难以为继了，张明决定接受武汉一家琴行教鼓的邀请，离开北京，“它都不能让我实现我向往的生活，我向往的生活是每天可以练鼓，但在北京做不到的。”很长时间里他只能练哑鼓——拿着棒子反复敲一块橡胶板。

他从初一开始学鼓，因为对张国荣演的那部《鼓手》着迷。他跑去书店买了本教材，倒扣几个大奶粉罐权当架子鼓。后来回武汉在琴行教鼓，他对琴行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能让他放上自己的鼓，并且可以每天练习3小时。

魏飞呢，去一家彩铃公司上了三年班，觉得不太合适又辞职。他在河北阿那亚有一间公寓，那一片邻居中的音乐爱好者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男女老少，自娱自乐。魏飞常常去他们的排练室，练琴，或者帮其他的爱好者捣鼓。

他也常常梦到达达，一般是在上舞台之前，出现这样那样的小差池，紧张得像学生时代每一场考试。

2017年平安夜，一场一百多人的聚会上，魏飞与业余乐手邻居们演奏了收录于《黄金时代》的《Song F》，结束时，背后投出了他在达达时期

的许多照片。

彭坦仍然活泼、会不断冒出想法，但其他成员都认同变化最大的是他——从任性变得更成熟。

达达刚解散时，彭坦想放弃音乐又苦于没有其他出路，游荡了一阵子，在音乐节上听到Supergrass乐队唱出《Moving》第一句“Moving, just keep moving”时，如大梦初醒一般决定继续做音乐。

2011年，他已经再次脱离唱片公司成为独立音乐人，在家附近租下一个排练室，叫它白房子。有一年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去那里，盯着大量音轨，然后找各路音乐人合作编曲。最后形成一张叫作《迁徙》的专辑，弱化词曲、使用大量配器。

“我要用我全身的力量告别傻白甜，所以我就做了《迁徙》。”彭坦曾在接受开眼采访时这样说，“我现在想起来，人生可能就一次，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就有一次会那样，之后再做就可能不是那样的状态了。那种状态是特别焦虑、紧张、密集、刺激、高浓度的。”

后来成为彭坦妻子的春晓形容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觉得这个人只有两个黑眼珠，什么杂念都没有的，一个很白的男人。

春晓对他产生极大影响，“我所有被大家看见的成就，都是她（的影响）呀。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现在也是这样，和达达乐队在一起。”

彭坦总说自己并没有经历过多么艰难的时期，最艰难也许就是达达早期，但是“我们的语言太匮乏，似乎提到摇滚乐就是特别坚忍，经历痛苦，其实不尽然”。如果说达达的核心，其实是这几个人一直在一个事情上保持一样的天真。

浮出水面

在达达乐队解散之后，《黄金时代》缓慢释放出了它的能量。此后数年中，又持续卖掉了数十万张，《南方》被广为传唱，这是后话。

重组后达达乐队参加了两次音乐节，出席了三次活动，他们常常会唱《黄金时代》里那首《浮出水面》。

这首带有转折意味的歌确实见证了乐队的两



2004年,达达乐队在天津宣传专辑《黄金时代》时留影

次转变。

第一次是从武汉的地下乐队到北京的摇滚明星,那时候他们完成了《天使》,开始《黄金时代》,达达希望在接下来这张专辑中展示他们复杂、严肃、职业音乐人的一面,“能够真正的展现自己。”

第二次便是分别14年后的重组,他们对于达达会如何发展没有具体和远大的抱负,没有欲望,没有犹豫,一切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彭坦仍然有干净的嗓音,吴涛仍然有跳脱习惯的吉他——时隔14年,他重新拿出那把Fender,魏飞仍然有温和的贝斯,张明仍然有势大力沉的鼓。他们决定把那首新歌叫作《再·见》——再次见到大家,也和以前说再见。

四人第一次重新以达达的身份站在舞台上是在2019年7月份的仙人掌音乐节,为此,他们花了两周时间排练。演出前几天魏飞和彭坦说,他可能会很激动,可能会在台上哭。彭坦就笑他。到仙人掌音乐节那天却是恰恰相反。

说不清是紧张和亢奋带来的错觉还是真正失误,彭坦那天总觉得自己唱得不好,他在台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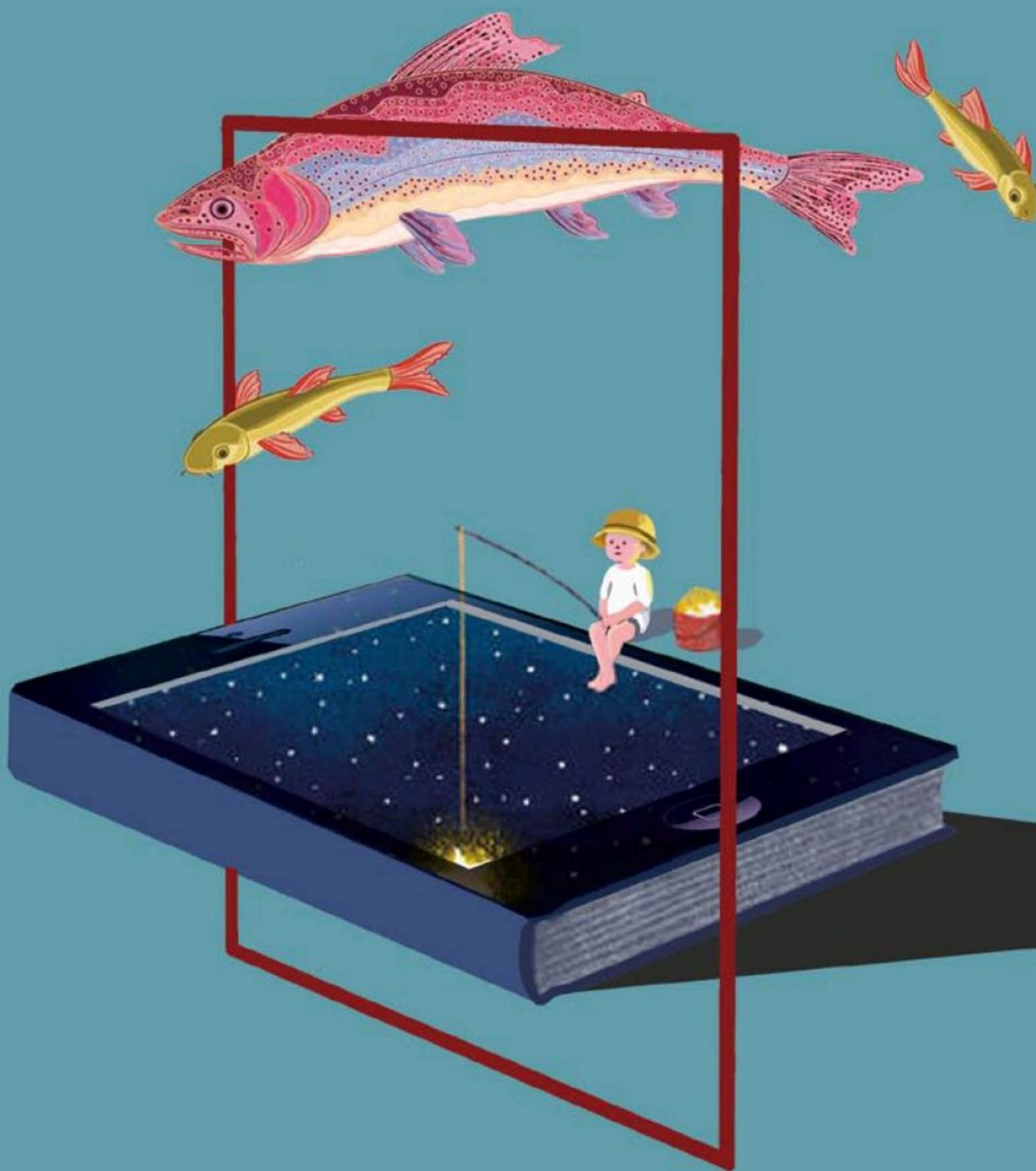
直道歉:很抱歉今天唱得很糟糕,太激动了,然后一直在跑调;失联了这么久,很抱歉。

后来结束他和大家去喝酒,被朋友们接着唱《南方》,他想如果有人拍下来,那他一定是得意忘形了,“一点风度和谦虚都没有”,之后好几天他都浸泡在这样的不清醒里,“傻开心。”

演出那天,底下有人举着一面黑色大旗,上面印着代表达达的图形,在两首歌的间隙,他们一齐大声喊“达达、达达、达达……”。

对于在台上的四位,这样的场景在十四五年前常常可见,但在这十四五年间已经远去。彭坦继续唱歌,魏飞去上班又辞职,吴涛为更年轻的乐队制作音乐,张明回武汉教鼓。张明信了佛,其他三位有了孩子,脾气里的急躁和任性都减少了一些。

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好像突然感觉这个乐队其实从来没有解散过,“所有东西都不一样了,但那气氛居然让人觉得无比熟悉。”



知识的海洋浩若星辰 鱼跃于天，星沉大海

The sea of knowledge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于2004年，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为己任，旨在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报道人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创刊十余年，已成长为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家庭读物的首选期刊。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南周订阅



邮政订阅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



鞠婧祎

偶像没有假期

特约撰稿 蒋顺发 何豆豆 发自北京 图 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没有工作的时候,鞠婧祎喜欢窝在房间里看电视,尤其是有线电视,“正在进行时态的东西,能给我一种生活感。”

什么才是合格的偶像?大众通过质疑给出了他们的印象,而鞠婧祎则用实际行动回应。围绕在她身上的争议,更像是一场关于偶像定义的论战

自从资本热衷于跃进式地批量制造偶像,从一个平凡普通人到娱乐圈流量偶像只需要一个夏天的时间,“后浪”们前赴后继涌来,偶像团队正在经历新一轮扩容。

与此同时,身为“前浪”的鞠婧祎也因为一档综艺而成为舆论焦点。随着偶像这种舶来品日益在国内娱乐圈扎根壮大,如何定义偶像?花路又该通往何方?围绕着“偶像”这一职业,舆论一直争论不休,这也是鞠婧祎出道7年来一路所经历的。

从某种意义而言,当鞠婧祎主动选择了偶像这条道路,并试图从小众走向大众时,她也在将自己暴露于某种喧闹之中,同时承受着拥趸热捧和反对者冷眼的双面夹击,并接受了作为偶像被规范和被误读的命运。

完美强迫症

鞠婧祎对于《我要这样生活》会引发争议,似乎早有预判:“我很少上综艺节目,因为没什么社交能力,要很快跟

人家熟起来玩游戏，总觉得有点尴尬。”在这期节目录制及出街之前，我们与鞠婧祎有过一次长谈。经过一天的接触，辅以其朋友同事的还原，诸多荧屏之外被折叠的生活细节得以展平，与节目中她所呈现的状态不谋而合。

在节目中，她被要求和同场的范丞丞互动，但打完招呼后她便陷入沉默，场面一度冷掉，直到杨迪替她解围。高冷自我、不好相处，是大多数与她打过交道的人对她的最初印象。因为怕生，在剧组她很少会主动搭讪，而其他人则觉得她不愿意融入集体，只想跟自己玩，僵局往往就这样产生。

“其实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来跟我搭讪一下。”2020年初，鞠婧祎的新戏杀青，意外的是，她收到剧组同事很长很长的短信：“原来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重新认识了你。”

“听到这样的话，我还蛮开心的，说明大家终于看到了我真实的一面。”鞠婧祎说。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段时间来熟悉她的慢热，并都能接受这样的“真实”。给她带来争议和麻烦的是她在节目中呈现的独居生活，视频滤镜中的“素颜”、吃一口面包嚼几十下的习惯、撞到家具后的反应、费力切菜的动作……都被网友们一一放大端详，并从不同角度揣测解读，以此来佐证她的“做作”和“假”。

这是鞠婧祎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示偶像身份之外的私人生活状态。在大众既往印象中，她因为“四千年一遇美女”的标签破圈出名，是日系偶像女团SNH48的正统代表，身负万千忠实且狂热的宅男粉丝喜爱，顶着总决选双冠王的桂冠，是自带流量和偶像金甲跻身娱乐圈的励志传奇。曾经，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她始终妆容精致妥帖，行为和作品滴水不漏，从不悖逆大众喜好，一直是正面偶像的典范。

但在现在的综艺节目叙事中，明星们得彻底抛却滤镜去过“反转”的普通生活，才更符合观众的期待。比起‘我要这样生活’，可能对明星们来说，这应该称为‘要我这样生活’才更贴切。显然，节目里鞠婧祎呈现的私下状态并不符合这种议程设置。

独立单飞的她至今仍然住在曾经的公寓宿舍里，因为懒得搬家，也离不开习惯了的热闹的宿舍环境。一年中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横店拍戏，回上海的时间很少，住酒店成了常态。不工作的时候，私生活简单到无趣，喜欢睡觉，睡醒了看个电影，吃个火锅，就足够令她开心。

她自曝爱好是吃东西且无辣不欢，但工作人员却透露她每次吃得很少，每个菜吃个两三口就差不多了，绝对不会多吃。一道菜只吃几口，一口面包嚼三十多口，其实她一直如此。

相比于年轻人普遍热爱的社交和游乐，她更热衷于养生，日常拍戏的时候，她都是雷打不动的晚上准时早睡。

没有恋爱绯闻，没有出格言行，没有不良嗜好，在工作之外鞠婧祎展示了一种克己的自律生活，这令她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偶像的职业自觉：力求完美。

“这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并没有很苛刻，我是一个很束缚自己的人。”在采访中，我们试着让她描述眼中的自己，她先是摇摇头表示无法形容，斟酌再三她给出了一个词——“强迫症”，“强迫自己做好每件事。”

这种自律一方面来自于年少时的性格养成，从小她便被安排了各种各样的特长班。为了防止她学坏，无论工作多忙，妈妈始终坚持接送她上下学。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偶像职业的长期规范训练。SNH48原型是来自于日本的大型女子偶像团体AKB48，通过挖掘选拔素人少女，依靠可见面的剧场公演模式吸引巩固粉丝，并以残酷的总决选优胜劣汰，这个庞大的偶像帝国依靠其强悍的培养机制，在近十几年垄断并振兴了日本少女偶像行业，将一批又一批少女，从朴素不起眼的原石打磨成闪闪发光的钻石。

鞠婧祎正是这个模式中国化至今培养出来的第一位纯血偶像。19岁通过二期选拔入团，直到2017年达成总决选二连冠后宣布成立工作室单飞，鞠婧祎在SNH48模式下工作生活了近4年，她的所有重心皆围绕着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偶像。

这个偶像帝国寄托着无数少女渴望被点化登顶的梦想，却也有着严格的奖惩机制和严酷的竞争模式。8年内SNH48经过十三期招募，从只有几个观众的冷清女团一路发展壮大，巅峰时期拥有五大城市分团、上百号现役成员。

在众多成员中，不乏比鞠婧祎外形条件更优秀的选手，也有比她性格更讨喜的少女。但只有她一步步从边缘走到了团队C位，凭借着毫无疑问的人气成功登顶总决赛，并进一步借助冠军的跳板，投身主流娱乐圈，成为流量演员，走上了春晚的舞台。

鞠婧祎的成功并非易事，要想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背后是几百场公演积累下来的实力和人气，是每一个被她性格所吸引的粉丝，更是她无可指摘的偶像形象。

一路蜕变而来的坚忍心态，早已化成了她对于规矩感的把控和身为偶像的一种长期自觉。在偶像动辄因一些失格行为而被舆论口诛笔伐的当下，鞠婧祎在规矩方面做到了无可挑剔。

还在团里的时候，只要是能坚持的公演她一定会去，公司规定签名会不能给粉丝to签，再熟的粉丝，她都不会破例。微博不能回复粉丝，私下不能联络粉丝，她也从来也没有逾矩过一步。

注重形象，私生活简单，个性乖巧，形象正面，鞠婧祎在某种意义上是SNH48模式偶像的标准答案。她也从没有觉得辛苦，叛逆更无从谈起，对她来说，规矩一旦设定，能干就能干，不能干就绝对不能干，不能去改变。她自己会有一些‘公式化’的习惯，长期的自我规定让她会下意识去做一些‘应该有’的反应，但也因此导致有时在‘自然’的状况下显得‘不自然’。“我这个人蛮奇怪的，有强迫症，属于那种，我在干这件事情，所有都是应该的，我没有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她说。

往角落里躲

在没有职业偶像土壤的内地娱乐圈，突然成就了这样一位从素人闯进主流视野的少女偶像，鞠婧祎走的每一步都无先例可循，而她每一次与大众短兵相接，都免不了要经受带着怀疑的审视眼光。

什么才是合格的偶像？是要更符合偶像标准？还是要更贴合大众需求？大众通过质疑给出了他们的印象，而鞠婧祎则用实际行动回应。围绕在她身上的争议，更像是一场关于偶像定义的论战。

最开始，鞠婧祎被认为不够“偶像”。从二次元圣地诞生的AKB模式，以及依靠宅男粉丝逐渐壮大的饭圈，这些天然的基因让SNH48这些养成系女团，在大众定义里总是与二次元、可爱萌系深度关联。

鞠婧祎进入女团颇有些戏剧化，领居家的姐姐帮忙投的应征简历，在入选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少女偶像，只是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天真地以为能参加一个歌舞团好像也不坏。

成团后出去参加活动，有粉丝在合照时总会要求“卖个萌”吧。每到这个时候，鞠婧祎都会觉得尴尬。跟其他打着可爱萌系人设或亲和日系标签来争取台下粉丝的成员不同，没有当过“偶像宅”、没有饭过日韩系偶像的鞠婧祎根本不懂何为与粉丝互动，那时候她在团里是出了名的“高冷”。“可能她觉得唱歌就好好唱，跳舞就好好跳，但那时候很多日系粉，就会觉得她很高傲，因此黑她的人也不少。”资深粉丝小卓表示。

“为什么我们要被这样定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我要证明自己。”鞠婧祎并不打算迎合这种设定。

她证明自己的方式是靠舞台实力。在小卓看来，鞠婧祎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是她吸引粉丝的关键，“虽然她那时候刚开始舞台表演，镜头感不是很强，但跳舞特别认真，每次公演，她的节奏和卡点都做得很好，有时候即使不是C位，她也跳得很认真，从不糊弄划水，她的实力在舞台上特别惹眼突出。”

SNH48音乐制作人滕兴瑞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鞠婧祎，是在她所在分队的首次小剧场公演上，她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成了二期生中公演唯一的solo，这让他印象尤为深刻，“新人时期，所有选手都没有资源，一视同仁，能solo表演，是她靠实力争来的。”他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女孩。同年在广州万人演唱会中，鞠婧祎独挑大梁，“那

时候她刚出道，第一次站在这样的舞台上，还是唯一一个有 solo 歌曲的成员，我们当时还挺担心的。”但她一下子就 hold 住了。

圈层内部的粉丝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观察消除偏见，但要消除大众对偶像的刻板印象并非一日之功。

2014 年，彼时还只是在 SNH48 团内小有名气的鞠婧祎，因被日本网友评价为“四千年一遇的偶像”，而第一次被外界所熟知。

这句冲破次元标签简单又粗暴，既肯定了她的颜值美貌，为她吸引了大规模的圈外注意力，却也在无形之中遮蔽了其他特质，为她带来了铺天盖地的争议。

蜂拥而至的关注和聚光灯专注于拆解她的外貌，致力于寻找瑕疵，舆论也开始对她展示了不友好的一面：对其日系偶像身份的刻板印象，对只有外貌没有实力的粗暴定义，对过度炒作的猜测。

第一次面对大量陌生的诘难，当时只有 20 岁的鞠婧祎一度崩溃。丝芭传媒副总虞星辰见证了整个过程，他与鞠婧祎共事多年，唯一一次见她因为非工作需要掉眼泪就是这件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很小心翼翼，尽量在她面前避免提及这段过往。

粉丝们同样对这个标签又爱又恨。他们一方面清楚地知道，争议性的标签为她带来了大量的关注度，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谁能占据舆论焦点，谁就掌握了成功的关键。但另一方面是流量带来的反噬，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揪着这个标签不放，对她进行攻击。

“多数人碰到这种情况肯定是会爆炸，扛不过去的，小鞠能做到被骂也不去说多余的话，她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没有去炒作碰瓷，她扛过去了。”小卓见证了她这一路的变化。

“时间可以治愈我，可以带走很多东西，往前走，把这些甩在身后慢慢忘记就是最好的方式。”若干年后，再度谈及这段经历，鞠婧祎显然已经释怀。

借着总决选冠军所匹配的影视资源，鞠婧祎开始逐渐将重心转向表演。非科班出身，从来没



有接受过表演培训，就这样突然成了演员，就如同不知道职业偶像是什么，就进入了 SNH48 一样，选择走出小众的偶像女团粉圈，走入主流视野，也意味着一切需要从头来过。

那时候，她最害怕的是每次刚进组时陌生人探究的目光。尤其是定妆的时候，好几个工作人员一齐来围着她，指指点点，“一般这种时候我都想要找个地方躲起来，但那种时候你得假装淡定，其实进那个化妆间，我都觉得自己要‘死’了。”

这让她有时候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她的职业注定了被围观，但她既害怕被看见，又要强行武装自己，维持着表面上的得体。

“说实话，你进剧组，剧组那么多人，没有

人了解你之前是干什么职业的，是不是偶像，只知道你是演员，你来演戏。”鞠婧祎清楚地知道“偶像”的身份并不会为她作为演员带来任何便利或加持，没办法只能顶着头皮去演。

扛过去是她一直以来面对争议时的唯一方式。“其实每件事情对我来讲都挺难的，我总会先把事情往坏了想，然后自己给自己信念，一步步让自己自信。”这是鞠婧祎特有的自我调节方式，一种姑且可以称作悲观者的乐观情绪。“可能现在好一点，但也没有好太多，只要人多的地方，我就想往角落里钻。”

面对疾风吧

其实鞠婧祎大可以继续留在 SNH48 的顶点做她的女团偶像，享受着绝对 C 位的荣耀，以及来自粉丝的毫无疑问的热情和崇拜，而不用去面对外界的血雨腥风。

但养成系偶像的使命，是与粉丝共同成长。在追随着偶像从平凡到成功的追梦之路上，粉丝也从凡俗中感受到激励和共情，而“追逐梦想”是没有终点的。

对于这份职业，鞠婧祎说她唯有一个方向：得往上走。“我是一个很需要新鲜感的人，我不喜欢原地踏步，一定要往上走。不管这一步走得大还是那一步走得小，都是努力的结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同时兼顾着偶像与演员的工作，叠加的工作强度不难想象。她还记得有一次拍戏，早上 5 点就出工，一整天拍的都是重场戏，一直拍到凌晨 1 点收工，回酒店卸完妆，坐车直奔上海，化妆后就开始进棚拍团内新歌 MV，拍完又回横店，再化妆继续拍昨天的那场戏。

“整个人都懵的不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回忆起那段时间，鞠婧祎坦言有过想要逃跑的念头，那是她第一次去横店就遇上多年难遇的寒潮，天气阴冷，牙齿上下打架，每天黑压压难见晴天。又恰逢过年期间，没有戏拍的时候，她只能在剧组一个人待着哪儿也去不了。“我觉得我那时候都要得抑郁症了。”

鞠婧祎四年拍了 9 部电视剧，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中度过。当大家都已经习惯以演员身

份看待她的时候，她又着手回归舞台的计划，前不久她实现了两年前告别小剧场舞台时许下的承诺，与 SNH48 的成员有了一次合体表演。如果不是疫情导致计划延迟，她今年还将发新专辑，并有意进军海外市场。

永不满足，追求向上，鞠婧祎的确称得上是一位敬业的恪守着“王道”的正统偶像。而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和自我职业约束之下，身为偶像的鞠婧祎，个人生活中的鞠婧祎，到底哪一个才算真实？抑或两者都是，只不过是她的一体两面，因为偶像是没有假期的。

工作透支了她的生活，只能通过一些方式找补。没有工作的时候，鞠婧祎喜欢窝在房间里看电视，尤其是有线电视，“正在进行时态的东西，能给我一种生活感。”

之前拍戏时，每天开车去片场，沿路会经过一些水果摊，叫卖着当季的新鲜水果，有时候她会特意停车光顾他们的生意，在挑选水果的几分钟，她感受到了久违的生活气息，“很热闹。”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节目中，和好友久违地走在上海街头、逗逗猫学做菜时，她难掩雀跃地说着“开心”、“快乐”。尽管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做作和浮夸，但正常的生活对她而言，已是难得的奢侈。

鞠婧祎有时候还会怀念在团里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就像一起去玩一样，也不像工作，就是一群人一起。”她也明白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她有时还是会害怕一个人睡觉，需要房间里留两个工作人员陪伴，才能安心睡觉。尽管已经面对过很多舞台了，但她仍保持着需要熟悉的工作人员在场的习惯，即使没办法陪她上舞台，但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安全感。

制作人甘世佳曾根据对鞠婧祎的认知，为她量身写了一首歌叫《孤独与诗》，歌词里写“她很清楚，越往更高越是寂寞”。

“最感同身受的就是孤独感吧，因为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在奋斗，”鞠婧祎其实一直都很清楚，路还是要走下去，因为她还想要往更高的地方去，“那就面对疾风吧。”



VLADIVOSTOK

符拉迪沃斯托克

不宜飞行

图、文 DLL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 11 月的一个周六。我和朋友由市中心的民宿出发，沿海走五分钟，到达胜利广场的周末集市。围绕着为纪念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而建的远东苏维埃政权战士纪念碑，市民运来鲜花、猪肉、泡菜、饼干和千奇百怪的海产品售卖，人们在临时搭建的棚下安静地排队。

我试图用英文询问不同色号奶酪的区别，面目沧桑、气质像刚从渔船上下来的大叔用俄语回答了我。附近一位女士热情帮忙，扭头与我说了一串韩语，不时用手对着各类奶酪指指点点。

类似的情况不止一次，餐厅和咖啡馆的店员会好心递给我韩语菜单。由于地缘关系，市里最多的亚洲面孔是韩国人，市区亦有不少韩国人投资的酒店商场，这是这座城市最接近东方的一面。将近一周，我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找到任何早于

1860 年的痕迹，从剧院、广场到密布的东正教堂，海参崴的城市景观早已被俄罗斯的审美强力重构，正如它被割让后新名字的寓意——“控制东方”。

苏联解体后，这里又被西方的消费文化渗透，市中心高大的标志性建筑物被巨大的 ZARA 门店占据。万圣节前，我踏入的所有餐厅都精心布置了南瓜、鬼脸，认真渲染原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节日氛围。作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该市还有种不相衬的休闲气息：胜利广场背后的港口一直停着两艘军舰，下午 4 点，军乐队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演奏，日头渐落，市民边喂鸽子边吹口哨围观。士兵三三两两在海边的花园散步，海军帽的带子被风吹得飘起。不远处，绿色

在路上 ON THE ROAD

SUPPLEMENT 后窗

的 C-56 潜艇就泊在岸边，这个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退役后被分割、运输至此地，又被焊接复原，里头有完整的驾驶室、潜望镜、鱼雷，有教育意义，但来往之人并不为之停步。

“那地方我到现在都没去过。”第二天，一个二十出头的哈尔滨男生开着车大咧咧地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此行遇见的唯一国人，三岁跟着做生意的父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国读初高中学无所成，好歹逼出一口俄语。我们讲起前几日沿着市中心坡道向高处走，不出 40 分钟到一片山顶，地图标记是城市制高点，从那里看，紫红色落日下的金角湾很美。他说，他上的不知名大学就藏在那制高点背后。

不过他的主业是开车接待想尝鲜打霰弹枪、开直升机的中国游客。几天前，通过一个宣传图全是俄国面孔的淘宝店，我

T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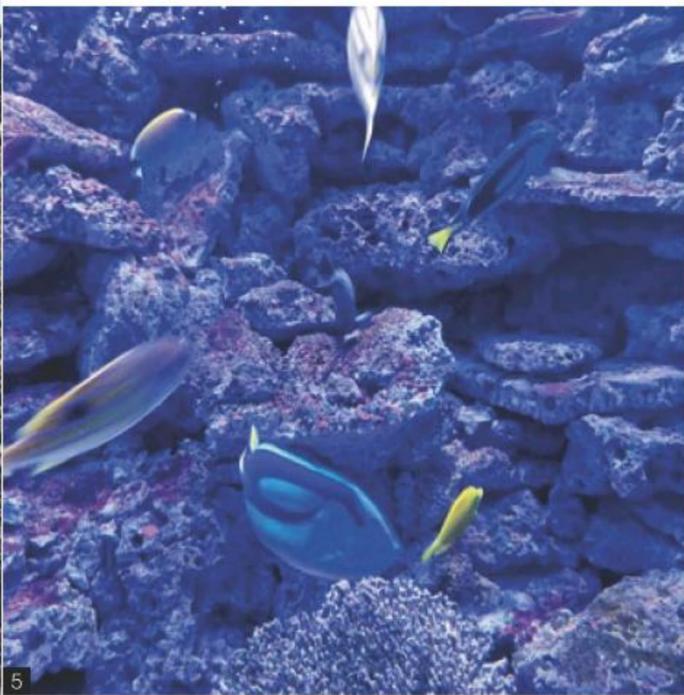
-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乘公交车下车时付费，不论你提供何种面值的钞票，司机都可以找钱；
- 推荐参观世界排名第三的普里莫尔斯基水族馆，可乘公交车经跨海大桥前往俄罗斯大岛，沿岸都是优美海景，还能遇到很多英俊的海军士兵

- 1 托卡内夫灯塔，被称为“世界的尽头”
- 2 游客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制高点等待日落
- 3 海边，可能有蛇出没
- 4 日落后的金角湾
- 5 普里莫尔斯基水族馆
- 6 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制高点
- 7 胜利广场的周末集市

买下 800 块钱飞行 15 分钟的体验产品，最后被拉到了有他在的微信群。

通过他，我终于奇异地接近了媒体宣传中的俄罗斯。车过加油站，前头的一辆车后挡风玻璃裂了个大口，居然就用胶布粘上了，我们大惊小怪，他讲大家保险杠坏了也是这么粘的。他又说起俄罗斯生猛粗犷的国民性，某小学拟让全体学生课上练习蒙眼打 AK48，“真的是战斗民族。”

驶出市区一小时后，手机没了信号，车穿过林中小道停在小小的停机坪。与我们握手的是一位面红须白的飞行员大叔，退役前开过 29 架飞机，现在身着体面但已褪色的飞行服。友好地点头、握手后，他吐出一句不甚标准的 "Please!"，指引我进一架漂亮的红白色单翼单螺旋桨直升机副驾驶位。





俄罗斯大岛无人的海边

这天晴朗但风大，大叔微笑着表示无事，哈尔滨小伙也说这不算事儿。上天的体验与我想象中仅单手扶方向盘便能保持飞机平稳滑行、再悠哉掏出手机录几段视频迥异：小飞机摇摇晃晃地直升上空，不停地向上下及左右摇摆，在大叔的意志下坚持跌跌撞撞越过麦田、公路和树林。

机舱狭小，斑驳的灰色导航仪有些年份了，三个透明球面下的指针晃来晃去，让我仿佛置身灾难片里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紧紧抓着舱门附近的把手，感觉在扯着一片快要被卷走的叶子。耳机里断续传来大叔的指令，刚刚转译成难以捕捉的英文，很快又被风声赶走。

我没等来安逸平衡的时刻。五级大风里，大叔将机头向左一偏，我们进入了更危险的倾

斜状态，右边视野里的公路消失，飞机带着我们似乎要被倾倒入下方的一条小河。恰在此时，大叔的一只手松开方向盘，边咧嘴边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Please!" 见我僵持，他憋出可能是他会的唯一一句英文。

我斜着身子摇摆，想起卡在打人柳里的哈利·波特，坚决地摇摇头，再摇摇头，手绝不松开。他了然，继续给飞机掉头。

感觉有一小时那么久，我们终于降落在停机坪。坐上车离开此地，我终于回忆起从高处向下望时，曾联想到巡回画派作品里的农田，还有《猎人笔记》里的深秋景象。我没有驾驶飞机一秒钟，然而已身心憔悴。



工作场所 新冠肺炎防控指引

一、上班途中

建议步行、骑行或驾乘私家车上班。
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全程戴口罩。



二、先测体温再进办公楼

进办公楼前自觉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方可入楼，先洗手，后工作。



三、环境卫生及个人防护

每日通风3次，每次20~30分钟。
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以上距离，多人办公时戴口罩。
勤洗手、多饮水。



四、开会须知

戴口罩参加会议，开会人员间隔1米以上。
减少集中开会，控制会议时间。
会议结束后消毒。



五、食堂管理

分餐进食，避免人员密集。
餐厅每日消毒1次，餐桌椅使用后进行消毒。



六、做好消毒

每日对门厅、楼道、会议室、电梯、楼梯、卫生间等公共部位进行消毒。
定期对中央空调送风口、回风口进行消毒。



七、后勤人员防护须知

服务、安保、清洁等后勤人员工作时须戴口罩，食堂采购人员或供货人员、保洁人员还须戴一次性橡胶手套。



温蒂妮 都市历史中的 水形物语

文 周大宝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在欧洲中世纪传说中，温蒂妮是拥有永恒生命的水中精灵，若能与凡人男子结缘，她便可获得灵魂，同时失去永生；而如若遭受男子的背叛，温蒂妮便会杀死情人，重归水中。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将这一古老的故事置于当代柏林，以短短 90 分钟的篇幅完成了一部高度凝练的迷人作品《温蒂妮》。在刚结束不久的第 70 届柏林电影节中，《温蒂妮》入围最佳影片，女主角葆拉·贝尔最终摘得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影片以一次摊牌开场：温蒂妮的男友约翰内斯另结新欢，向温蒂妮提出分手，并且只给她一杯咖啡的时间接受此事。温蒂妮起初错愕、委屈，继而悲伤、落泪，当约翰内斯收到新欢的来电时，她忽然敛起了情绪，变得异常冷静，“你不能走”，她说，“如果你离开我，我会杀了你。”

若了解温蒂妮的文化意涵，观众已能感到约翰内斯的命运笼上了一层阴云，故事悲剧性的齿轮也就此启动。温蒂妮回到对街的城市发展局——她的社会身份是一名历史学者，兼任发展局的解说员。工作状态下的她从创伤中抽离，神态如常、作风干练。伴随温蒂妮的讲述，镜头在沙盘模型上平移，柏林城市规划的历史铺展开来。

佩措尔德不惜以枯燥乏味、长篇累牍、充满专业性和学术性的解说词构成影片的一层文本，如同一首乐曲中间隔出现的音乐主题。影片中段，温蒂妮进行了关于柏林宫历史的第二次解说，这座古老的宫殿曾被拆除，在市中心留下了一处空白，如同“被暴力截肢后出现的幻痛”，而如今，宫殿正在重建——21 世纪复原一座 18 世纪的宫殿，而 18 世纪的宫殿承载着 21 世纪的博物馆功能，这似乎是一个带有荒诞意味的悖论，正如温蒂妮所言，仿佛“不可能有进步”。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城市和建筑，与流转于真实柏林街巷桥梁间的回忆频频产生叠影，过去和现在以时而令人困惑的方式相互碰撞。

这种时空的交错感延续了佩措尔德电影中常见的风格。2018 年的《过境》以现代马赛为背景，将二战流亡的故事嫁接到当下的难民主题，过去的难民与今日之难民、历史与今生在一个永恒的过境空间中相遇，形成了历史错位的眩晕感；而在 2007 年的《耶拉》中，现实世界的异样感与折叠压缩的时间也同样被处理得十分巧妙。

与城市新旧交织的历史相映的，是温蒂妮“神话中的精灵”与“现实中的人”两重身份的矛盾统一。当讲解到施普雷河下游柏林的起源地时，镜头拉近沙盘，继而缓缓推进温蒂妮的面部，定格在她蓝绿色的瞳孔特写，她仿若忆起了前世；解说结束后，温蒂妮重返咖啡馆寻找约翰内斯，



却听见水族箱中的潜水员模型向她发出召唤，而恰在此时，男主角克里斯托弗走了进来，他正是一名在德国西部水库区工作的工业潜水员。当温蒂妮还沉浸在方才被召唤的错愕中时，超现实的一幕出现了：水族箱骤然崩裂，水流裹挟着水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两人躺在沉船残骸似的地板上被水流洗礼，如同两条被冲上岸的鱼。克里斯托弗小心拔去扎进温蒂妮身体中的玻璃碎片，伤口处有几点殷红。

水族箱的崩裂是神话能量的释放及其对现实的入侵——在温蒂妮身上，这两种力量相互博弈，维系着脆弱的平衡。此后，与克里斯托弗的恋情又将温蒂妮拉回现实，新男友的温柔让她获得了一段真实而具体的爱情，两人甜蜜的日常似乎冲淡了诅咒，使温蒂妮延宕了复仇。但超现实的情境依然似鬼魅般如影随形，带有逸出常轨的危险气息——克里斯托弗曾在一次水下作业中见到一条巨大的鲛鱼，并戏称它为德国民间史

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勃艮第王“大巩特尔”，当他带着温蒂妮潜入水下时，转眼之间，温蒂妮消失无踪，护目镜、脚蹼、手电筒纷纷落下，“大巩特尔”牵引着她离去。

不久，温蒂妮重遇约翰内斯，神话与现实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当晚，温蒂妮接到克里斯托弗的电话，后者表明自己知晓温蒂妮与约翰内斯的旧情，而在现实中，克里斯托弗已于当天下午遇难，他的腿在水下作业时不慎卡在了涡轮中（呼应了此前潜水员模型摔裂的预兆），导致大脑因缺氧时间过长而死亡。

温蒂妮遇到了真正的爱情，可诅咒也不得不应验。当她得知那通电话并不存在时，水族箱崩裂的情景重现，破碎的灵光闪动，那个声音再次召唤她回归。温蒂妮将背叛自己的约翰内斯溺毙，在一个清冷的夜晚重返水中。而就在这一刻，克里斯托弗苏醒。一切重归原位。

整部电影中，水是一个重要的元素。“温蒂妮”源自拉丁语中的“波浪”一词，“柏林”的原意是“沼泽”或“沼泽中的干地”，城中河流纵横，渗入了城市时间和空间的深层肌理。在佩措尔德灵动微颤的镜头下，水波充满了丰富迷人的意味：水族箱崩裂、水流涌出的悬疑与奇幻、克里斯托弗携温蒂妮水下遨游的诗性与浪漫、温蒂妮跟随大

巩特尔离去的幽冥之感、在游泳池里杀死约翰内斯的惊悚气息，以及片尾温蒂妮与克里斯托弗水下重逢的凄美和遗憾。水是母体，是新生，也是毁灭，是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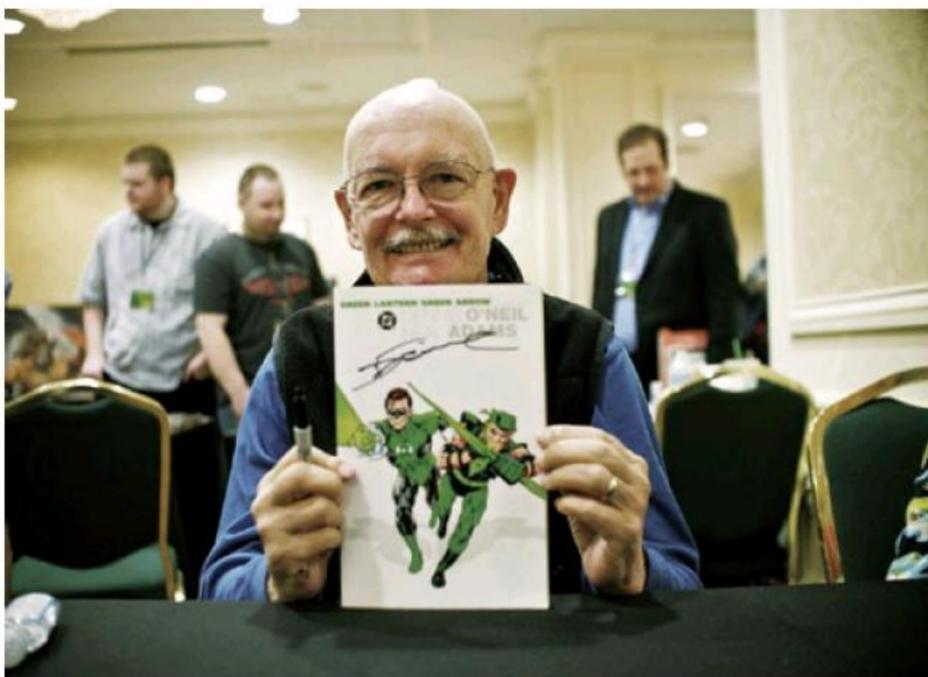
影片中依次浮出水面的三层文本——神话传说、城市历史、个人爱情就这样相互缠绕、忽明忽暗，在共同形成影片叙事动力的同时，也开拓了多义性表达的可能。迷雾般的神话萦绕在柏林建城史与现代都市景观之上，与温蒂妮的爱情交互共生，钢筋水泥与迷离水域分隔出两个空间，而城市和个人的历史与当下、虚实与真假就在其中摇曳沉浮。 



虚构的哥谭市和现实的隐喻

文 梁文雪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令我哭，令我笑。让我知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在此处举起我在彼处放下我。带我去从未到达的地方以及时间空间的尽头……”斯坦·李在《The DC Comics Guide to Writing Comics》一书中这样评价作者丹尼·奥尼尔。如今斯人已逝，这番话像极了丹尼·奥尼尔职业生涯的注脚。



丹尼·奥尼尔(1939-2020)
美国,漫画作家

奥尼尔少年从军，亲历了古巴导弹危机，退伍后在密苏里州为报纸写专栏，后来遇到贵人罗伊·托马斯，被其推荐给漫威的斯坦·李做助理编辑，就此入行。1960年代末，奥尼尔跳槽到查尔顿漫画，后又跟随老领导迪克·佐丹奴前往DC任职，早期负责的《美国正义联盟》的故事大获成功。

奥尼尔是最早把美国本土社会和政治话题引入超级英雄漫画的编剧，他的议题涉及毒品泛滥、种族主义和其他社会积弊，为后来的《绿灯侠与绿箭侠》的连载奠定基础。如《绿灯侠与绿箭侠》第85-86期的故事 Snowbirds Don't fly：绿灯侠和绿箭侠发现少年英雄 Speedy 是个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借此探讨毒品对青少年的影响。

70年代，奥尼尔接手了蝙蝠系的故事创作，他谦虚地以“让蝙蝠侠回归原初”为名，实际上重塑了这位著名英雄。以蝙蝠侠为代表的超级英雄被披上了深沉黑暗的外衣，有了探讨社会和人性的内涵。奥尼尔也被誉为“给予蝙蝠侠沙哑嗓音的男人”。奥尼尔之后的漫画编剧如弗兰克·米勒，电影导演诺兰、施奈德多多少少都承袭了他的遗泽。同时奥尼尔还参与

重建了小丑和双面人的形象，让这些角色作为知名反派深入人心。他的作品贯穿了美国漫画青铜和暗黑两个时代，活跃期长达三十年，成为蝙蝠系作者中仅次于芬格的常青树。

美式漫画随着丹尼·奥尼尔等人的当红出现了一个较为鲜明的分野：较之美国队长代表的积极向上的、清教徒般的形象，

蝙蝠系更长于发掘英雄内心的矛盾甚至阴暗面。蝙蝠侠看似强大又内心柔软，向往人群又躲避人群，在肩负使命的超级英雄和自我身份转换之间徘徊。另一个反派角色小丑则被蒙上了一丝丝悲情色彩，在反面对立视野下和蝙蝠侠的双重人格形成了强烈的呼应。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丹尼·奥尼尔最大的贡献除了在漫画中引入现实元素，还有他极强的前瞻性。蝙蝠系中出现的种种人性的阴暗和社会的混乱，恰似今日陷入混乱的美国。“哥谭”一词在英文中有“愚人村”的意思，它同样也是纽约市的绰号之一。哥谭市以高犯罪率著称，罪恶假自由之名而行。或许丹尼·奥尼尔的初心就在于此，将暗黑漫画变成美式价值观和现实的一个隐喻。在美国深陷种族主义和新冠疫情泥潭的当下，奥尼尔的漫画仿佛从科幻漫画变成了写实漫画，他参与改编的电影也如科幻片变成纪录片一般。

有人说奥尼尔没有离去，只是回到了哥谭市隐居。出没于罪恶中的黑暗骑士并不被自己为之牺牲的市民信赖：多数善良的市民甚至不确定他的存在，只把他当作街头流传的都市传说。隐居的奥尼尔在混乱的当下，会创造一个新的都市传说吗？



独具匠心

设计小清新



我们把「未知」作为理性思考的代表，诚恳地印在包上。

「未读」书籍里的智慧，「未知」哲理的思索。

你需要一份理性的自我空间。

在人人必须跟随潮流的时代，

重磅新闻必须「已知」，微信消息必须「已读」，



扫码即可购买

